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文艺名家讲故事

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录

无愧时代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阎肃 · 002

生活教会我创作

刘兰芳 · 014

艺术工作就像头顶一碗水走路 一滴都不能洒

奚美娟 · 022

振兴民族动画的快乐奔跑者

孙立军 · 032

打动观众的一定是真善美

苏小卫 · 040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者”

六小龄童 · 048

好的作品应该写在人民的心坎上

叶辛 · 058

用交响乐为人们打开一扇心灵之窗

谭利华 · 064

用生命和热爱演好周总理

刘劲 · 072

甘做时代发展的“记录员”

柳建伟 · 082

用心唱好我们自己的歌

廖昌永 · 090

目 录

作家一定要找好自己的“准心”

李春雷 · 098

文学创作也需要“工匠精神”

范小青 · 106

演戏就好像凉水泡茶——慢慢浓

茅善玉 · 114

长袖舞出中国风

陈爱莲 · 122

好音乐要经得住岁月淘洗

付林 · 130

用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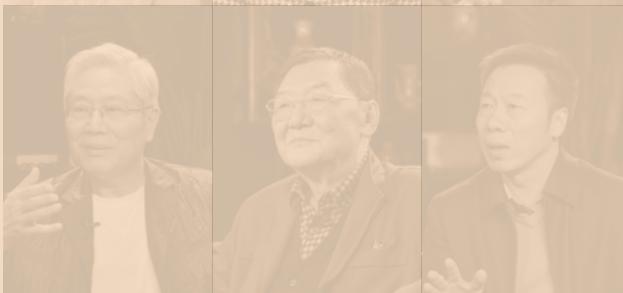
翟俊杰 · 138

观众之恩当“涌泉相报”

陈涌泉 · 146

后记

文艺名家
讲 故 事





阎
肃

原名阎志扬，1930年5月9日出生于河北保定，中国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词作家，空政原歌舞团编导室一级编剧，文职特级。主要代表作有《我爱祖国的蓝天》《红梅赞》《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歌剧《江姐》，京剧《红灯照》《红色娘子军》等。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模”阎肃的先进事迹。2016年2月12日，阎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无愧时代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最爱穿的是军装，最爱写的是军歌。从青年艺术队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到中国著名剧作家、词作家，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始终是勤奋、谦和、直爽。年过八旬，他却丝毫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自称为艺术战线的一名老兵，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首期邀请嘉宾：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阎肃。在150分钟的拍摄过程中，阎肃老师一气呵成，讲述了一些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从艺经历与心得，为我们留下许多珍贵影像资料。

弃学从艺，文艺工作大有可为

解放前，我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考上两所大学：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后来读了重大的工商管理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重庆大中院校的学生参加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夏季暑期学员活动。当时我是大专部文艺部的副部长，组织大家做文艺演出。说相声、演戏、唱歌，就在这座古城中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可能因为我的这点本事，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的青睐。领

导告诉我：“你不要念书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我欣然答应。我觉得我要给新中国干点事儿，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1950年9月大学还没读完，我就加入了青年文工队，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下属青年艺术工作队的一个队员。

当时，我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我。我的同学有考北大、清华的，有留学捷克、苏联的，他们觉得最没出息的就是我了，好好的大学不念，唱戏去了。我当初有一个初恋情人，都订婚了，她后来去北京念大学，也因为这件事跟我分手了。

在青年艺术工作队期间，我们跑遍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那时候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市。重庆在抗战时期人文荟萃，文化人基本上都在那儿待过，共产党的领导人都都在那儿待过，比如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周总理在那儿有周公馆；《新华日报》当时也迁到了重庆。许多文学家、剧作家、电影人、文化名人在抗战时也都在重庆待过，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他们的小说、剧作都很受我们追捧，可以说，我们是吃着这些文化巨人的乳汁长大的。

同时我们也看当时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经典电影，比如《卡萨布兰卡》等，我们当时对于国外文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

事无大小，要做就做最好

我原来在文工团，什么都干过，拉过大幕、干过舞台照明；唱过合唱、跳过集体舞；说过相声、还催过场……但我到



阎肃（右）早年说相声剧照

现在都还会想，就算是拉大幕也要把它拉好，绝对不是机械式的简单工作，我要拉的快慢和导演心里想的节奏是一样的。

当时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就像一个椭圆形的灯泡辐射出很强的光。这个灯罩有一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我就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让它四面不着地儿，把中间的口焊住，让空气流动，避免了油气附着。然后，我走到哪儿就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到七八次。后来，到了部队才懂“一专三

会八能”，文工团演出需要这样什么都会的人。

我当然也会有缺点，就是有时候好表现自己。有一次，我在话剧《爱国者》里演伪村长蒋三宣，蒋三宣劝一个老太太投降当汉奸被老太太怒斥。当蒋三宣灰头土脸要走时，有一句台词是“老太太，那我可走了”，这意思就是你等着吧！我带着诙谐、有点儿冷笑的情绪说了这句词，台下“哗”的一声，有笑声有掌声，我当时好得意。临出门我又回头说了一句“老太太，我可走了”，底下又一阵叫好。于是，我又绕到了窗口口冲着老太太再来一遍。一句台词说了三遍，三遍语气重心还不一样，戏里面可没这个。下了台，导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我“胡闹”。当时的主演也不干了，说他怎么那么多话。这就是我当初年轻不懂事，好出风头犯的错误。

深入生活，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后来，在青年艺术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青年文工团。我当时的任务是到处去做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见过城里人、农村人、国民党的兵，甚至特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普通干部。接近这些不同的人，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跑了四川各地，和各色人等都熟悉了，带给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后来写歌剧《江姐》时的顺理成章。

当时我根本没想过今后会搞创作，更没想过多少年后我会写歌剧，只是简单地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心满意足了。对于舞台、对于文艺工作，自己能做得津津有味，这可能是源自

于我从小对这些事情的热爱。

四岁的时候，我爸爸就领我到票房里去学京戏。京戏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满大街都是唱戏的。后来念小学、中学时，有一段时间我家被日本人炸光了，我就跟着妈妈到修道院里去避难。我妈妈帮着神父打零杂、洗衣服，我就在修道院里头相当于做修士的工作，准备将来当神父。那时候，我跟着教会学拉丁文、国文、数学。教我国文的是一个老神父，是清末的秀才，不懂白话文，只懂古文。他教我们《四书》《五经》，所以我现在的古文底子就像私塾教出来的一样。

步入军营，从文工团演员到普通一兵

1953年，我们整个西南青年文工团都到部队当了兵。我这一当兵就是60年。1960年左右，大约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领导忽然发现了我有点儿写作的才能。我那时业余时间写过一些汇报剧、街头剧、相声之类的。我在文工团是演员、合唱队员，写过一个作品，演出获得了好评，再写一个作品又受到表扬，我自己很得意。突然有一天，领导把我叫住说：“我们考虑再三，你去搞创作吧！”我说不干，业余写着玩还挺好，写好了有表扬，写不成了也没人打屁股，多自由。领导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就表示我服从，但搞创作我干不来。领导说很简单，你去深入生活。怎么生活？就从文工团到部队去当兵。

那时候我一个人，也没有对象，说走就走，下到了广州沙

皮的空军部队。我去的那个机组中队，有机电师、机电兵、两个机电员，还有作为下放干部的我。刚去第一天，谁也不认识，心里还在想就这样开始当兵了。晚上稀里糊涂地睡到半夜12点40分左右，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睡在我下铺的大个子机电员是山东胶州人，说话带着很重的山东口音。我谁也不认识，背包打得像鸡蛋糕一样，就跟着大个儿往外跑。跑着跑着，俩队伍一交叉，我就认准了跟着大个子跑，一直跑到机场的另一头。前面大个子一回头，一口湖北话，我这才知道跟错人了。我问他我们机电小队在哪儿集合？他给我指了另一个方向，离得很远。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回小队集合的地方，跑到的时候，队伍已经解散了，这就是我下部队的第一天。从第二天起，让我去种菜，解决伙食问题。我从买菜籽开始，回来间苗、浇水、施肥，一直到把菜收割，收拾进厨房。种了四个月菜，我连飞机的影子都没看到。说是到空军部队锻炼当兵，却连飞机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心里特别不高兴，我眉头一皱，谁都不理。

后来，我们一起下部队的四个人凑在一起吃晚饭，又到后山上散步，大家都唉声叹气的，情况都一样。合计之下，我们觉得这样太被动、太没意思了。不能这么混日子，把“要我当兵”变成“我要当兵”，主动争取。于是，我当天回到部队里，就拉着大个子聊了起来。我岁数比他们大，相对见多识广，对于文工团的演员等更是如数家珍，很快我们就打成了一片。之后，他们就开始领我到外场去刷飞机，再做一些加油、分解轮胎等工作。我给他们变魔术、讲相声，慢慢地就和整个地勤部队、

飞行员们都熟络起来，已经忘掉自己是从文工团来的身份了。

扎根基层，寻找创作的源头活水

下部队一年后的一个傍晚，这个场面我至今记得。那天，在飞机场的跑道尽头停着八架飞机，我和机电师扛着旋梯去做检查，看到最后一架飞机的飞行员小王，正坐在飞机上望着天空发呆。那一刻，他的背影映着漫天晚霞，美丽迷人。我感到很好奇，心想他在琢磨什么呢？机电师告诉我，他心里惦记着头顶这片天，作为飞行员的他们深深地热爱祖国的蓝天。当天夜里，我情不自禁地在被窝里琢磨出了一首诗叫《我爱祖国的蓝天》。后来，我们文工团下去演出，我们就把这首歌做了出来，在部队唱了快60年。

如果你要问这首歌是怎么来的？我的回答就是当兵得来的，这就是生活。是我在部队老老实实当了一年兵，把自己当成部队的一员才悟到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你之前在屋子里面坐着找不出来的感觉。为什么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我真真切切体会来的。

再比如，1964年冬天我到西藏去，在西藏青藏公路上一走就是18天。那个过程，就像炼狱一样，脸上晒出了蝴蝶斑，眼睛都快得了雪盲，高原反应很严重，成天都喘不过气来。到兵站里休息，那个时候没有高压锅、没有火，蒸的馒头外面是糲子里面是面粉。晚上睡觉，我穿着绒衣绒裤，底下垫了五床被褥，上面盖了四床被子，还觉得自己像光着身子躺在雪地里一

样，哆嗦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兵站上一个四川的小兵，脸红扑扑的，给我打来一盆还带着冰碴子的水，让我洗把脸。我问他在那里待了多久？他说两年。我当即给他敬了个军礼，我说：“你是英雄！”他就在这样一个恶劣、艰苦的环境里甘之如饴。出门是雪山，关门还是雪山，连棵草都没有，我问他：你怎么过来的？他答：我很好，每天都有不少的同志路过，还有首长们，为你们服务就很好。他是快乐的。这个经历，让我觉得要更加贴近基层，内心更加充满了真情，才能体会到真实的生活。

精益求精，做有深度的文艺作品

现在很多流行的文艺作品，是在一种快节奏、急于求成的社会环境下创作出来的。我有我的看法，有我弄不明白的地方，但我不是一味排斥流行音乐。对于新事物，是需要马上反应的，不反应就落后了。

周杰伦有些作品我能明白，蔡依林的一些东西我也明白，特别是罗大佑、李宗盛，包括叶佳修、我所熟悉的汪峰，等等。罗大佑的很多歌，我非常喜欢。张雨生我也很喜欢，齐秦、蔡琴我也不反对，包括赵传这一辈人我都喜欢。但是现在最新出来的一些流行音乐，我有点不太接受。

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好歌，其生命就是旋律。不管古今中外的作品，好听、朗朗上口很重要。我觉得口水歌，唱八首跟一首歌一样，听不出其中的差别。



前排为阎肃及夫人，后排从左至右为阎肃的儿媳、女儿、儿子。

我并不反对流行音乐，我也听我也写，比如说《雾里看花》。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当时商标法颁布十周年要做一个晚会，我参与晚会的策划。那个时候假药、假货盛行，我就提议写一首歌来反映“打假”。晚会导演找了一圈人，说没法写，打假怎么写歌？然后，导演说谁出的馊主意谁来写。我心想，这还怪我头上了？那我就写，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写起来很难。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想不出来。我儿子在准备功课，不让我转了，让我回屋去。我一进屋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川剧《金山寺》水漫金山的情节。白蛇、青蛇钻进水里找不到了，法海找来了韦驮菩萨，请他找出白蛇、青蛇。韦驮菩萨手拖一根降魔杵，腿往脑门上一踢，脚尖碰脑门，踢出一只法眼。法眼，在佛家里

又叫天目，也叫慧眼。慧眼一开，上能看三十三重天，下能看十八层地狱。我看到这儿，心想太好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 一只慧眼，什么假货一眼就都能看出来了。但是，法眼、天目都不好写在歌词里，还是用慧眼好。那“我有一双慧眼”“送我一只慧眼”都不够通畅，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用了“借”这个字。“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纷扰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写出来这一句，觉得太棒了，这首歌有了。然后前面的“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很顺就写出来了，给作曲、导演一看，他们都觉得好。

从这首歌的创作看，就说明你要做有心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我没看过川剧，不知道这演的是川剧里的踢腿绝活。如果我书没看够，不知道佛经里有天目、慧眼这些典故，就想不出来这些词来。

甘当慈父，教育子女做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我没有决定过自己一生的道路，或者说去想我这一生必须要怎么样。跟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挑生活，让生活来挑你。时代也好、组织也好、环境也好，需要你做什么事，努力把它做好，对你自己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别人也会觉得快乐。我现在80多岁了，身体还好，脑子还挺好，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的要求，不去安排他们的人生道路，听时代的招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得起这个时代就够了。

我对儿女没什么太多的疾言厉色，没有要求他们必须怎么样。我有三条标准，一是正直，做个正直的人；第二是健康，身体得棒；第三是善良。至于从事什么职业，有多大的成就，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看你自己的努力，看你碰到的机遇，看你的准备，看你的勤奋。我的几个孩子，都是自由生长，他们独立生活能力也比较强。具体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很难去安排他们做什么事，也很难预料他们会做什么事，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好好地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怨天尤人，也不要过分地想这想那，做好每个人本分的事情，种好一亩三分地，多长粮食，就对得起这个时代了。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刘兰芳

1944年生于辽宁辽阳，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9年开始，先后有百余家电台播出她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影响海外。后又编写播出《杨家将》《红楼梦》等30多部评书，多次获国家级文艺大奖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生活教会我创作

她是中国曲坛“常青树”，80年代一部长书《岳飞传》让人们知道了“刘兰芳”的名字。十平方米过道，摆上饭桌当书桌；每天十几小时的创作，她印证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16岁拜师学艺，60岁读完大学，学习不辍是她不变的人生态度。

从小经受艰苦严格的训练

东北大鼓又叫奉调，发源地在沈阳。我的母亲、姨母都是唱东北大鼓的，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学大鼓。那时候家庭条件十分困难，中学的时候拿一个月七块钱的学校助学金，而且回住校。每天早上吃高粱米稀粥就小咸菜，中午吃高粱米稀饭，这样已经很满足。念到初中二年级时家里供不起，我就辍学去拜师学艺。首先拜杨丽环老师为师，跟老师一边学三弦，一边学大鼓。师傅家四个孩子加上我五个，后来实在养不起就让我回家。

回家之后，我开始跟姨母学《封神演义》。我的两个姨哥哥弹三弦，他们弹我唱。这个阶段学习的时间多，也逐渐有了基础。后来鞍山曲艺团的书曲队到鞍山演出，我去听书的时候被队长发现，他觉得我这个小姑娘不错，就让我报考曲艺团。

我背着行李来到鞍山曲艺团，到那儿一唱他们就收下了我。这不仅解决了个人的吃饭问题，还开始养家。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很贫穷，那时候能够吃上饭就十分满足。刚去的时候，我只穿了一件外衣，买牙具都没有钱。我们住的宿舍是一个低矮的小房子，一张小床，火炕也舍不得烧。东北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只能靠火砖取暖。在那些学员里，我是家庭最困难的一个。一起学习的女孩子家庭条件都比我好，父母都有工资。可是最后学成的只有我，因为我比她们都刻苦，我知道回家就没有饭吃，必须努力学习。

在曲艺团学习的时候，我们对面是评戏院，里面天天唱戏。我们曲艺团这边有三个说书的茶馆，老师告诉我们只能进茶馆去听书，不许去评戏院，电影院也不许进去。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博览群书，相通的艺术可以互相学习。老师只让我们背书，每天早晨起来去学校，一边练声一边做记录。在我们曲艺团二人转是两年满徒，相声、快板是三年满徒，而我所学的长书是五年满徒。

说书，观众买票才是试金石。一张票是一毛八分钱，那时候人们每月只挣三十多块钱，每天花一毛八分钱看演出是件很奢侈的事。所以说书一定要扣人心弦，时刻抓人心。每次我在台上都会留意当天来了多少观众，要是多三五个还好，如果观众少了，那么晚上就睡不着觉，赶紧琢磨说的书有什么问题。就是刮风下雨也不许差多少观众，说书的魅力就这么大。

辛苦生活中潜心创作《岳飞传》

1972年，鞍山电台请我说一些革命小说，我答应下来。当时我在电台录制了《海岛女民兵》《闪闪红星》《沸腾群山》《盐民游击队》《矿山风云》等革命故事。

到了1979年，电台的责编让我说一个传统书。我学过《岳飞传》，也喜欢这部书。但《岳飞传》没有书道子，每天要说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还得说三四个月，材料一无所有怎么办？

后来，有人在图书馆的废墟里找到一本钱彩原著《说岳全传》，并把书送给了我。但这本书太有局限性，比如我要说两个小时或四个小时，需要两万字左右，《说岳全传》上却只有很短的一段文字，所以要对原著进行删改增补。另外，我学《岳飞传》的时候是从“牛头山解围救驾”开始的，那时岳飞就要遇害了，而《说岳全传》是从岳飞出生开始，因此需要大量的编撰，比如“岳飞怒斩靠山熊”“和李氏结婚”等桥段都是我们挖空心思创作出来的。

那时我还在工厂当工人，每天下班回家照顾孩子，日子过得挺安逸，突然要说书，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因此，我一点点地往回倒。要说好一部书，书的结构特别重要，不精彩没人听，所以既要制造悬念激动人心，又要有人情味，让人听了有感觉，做到有文、有武、有悬念。

开始写作的时候特别费劲。家里的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过道既是厨房也是养鸡的地方，还要在那里写书。尽管条件十



刘兰芳夫妇编写《岳飞传》

分有限，但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苦，相反的内心有一种奋进的精神。我老伴王印权是唱快板书的，写完我就念给他听，时间长了他都不爱听了。我就换另外一种方式说给他听，一遍一遍直到他认同，我才开始落笔定稿。白天演出，晚上回来做家务、写评书。上半夜我写，后半夜把老伴叫起来帮忙修改，我五六点钟起来背诵几遍。当时，一段书是28分半钟，而现在22分半钟比，差很多语言，要是都写出来很费劲，所以基本没有写全。其实《岳飞传》没写多少稿子，一天要录一两万字，基本上只写三千字。其他文字怎么办呢？基本上是录制开始后，把醒木一拍即兴发挥，大部分都是这样录制出来的。

那段时间每天去电台录音，一天要录制两三段，大概需要四五个小时。早上八点钟去电台录评书，中午回来吃饭，下午一点钟上台说《明英烈》，晚上听书，半夜写书，第二天早上

再去录制。那段时间就是这么过来的，太难了！

现在想想确实不容易。为写好评书我反复修改，有时候气得直哭，撕了又重写。其实哪行哪业都不容易，想要做出点成绩绝不是一日之功，必须要倾注心血，要刻苦才行。

有筋骨的作品才能接地气、有生活

随着《岳飞传》这部书的开讲，“岳飞”这个名字更加深入人心。过去，老百姓没有太多文化，但都知道“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典故。我在创作和说书的过程中，就比较注重挖掘岳飞身上所体现的正面的东西。岳飞是孝子又是忠臣，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很有教育意义。

我创作、改编、演出的很多作品，都特别重视体现民族精神、传统美德，表现人物的精气神，彰显正义光明。既悬念不断、引人入胜，又入情入理、打动人心，让老百姓听完之后有教育意义。我想，也正是这一点，我的评书才广受各个层面老百姓的欢迎。

《岳飞传》正火的时候，我所到之处经常被人们认出来，也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坐火车九下山东、六下河南，火车上我不说话没事儿，只要说一句话别人就听出来，纷纷喊我让说一段评书。

有次去天津演出，我们路上边说边走，被环卫工人大姐认出了。这位大姐把我拦住，还大声招呼别人“刘兰芳来了”，让我给大家说一段。我们这行当就是接地气，就是为基层服务的，



刘兰芳在田间地头表演

于是我给大家说了一段，大伙儿挺高兴，听完依依不舍地走开。

在山东，有位听众从几十里外骑自行车给我送几个苹果，那个年代买苹果很不容易，他自己的孩子都舍不得吃。见到我之后，他跟我说：“刘兰芳啊，尝尝我们的苹果吧，润润嗓子。我们爱听你的评书。”那时我特别感动。

有一位吉林的老太太，实在买不到票，看着拥挤的人群，一着急把一盆水泼到了排队的人头上。还有一位老太太拿着字条来找我，条子上写着“耿大娘是我们这里的烈属，儿子在朝鲜战场牺牲了，请给她购一张票”。看完我很感动，赶紧请她坐到台边。听完一场书，老太太很知足，乐呵呵地走了。

那时我收的信最多一天是50封，装了一麻袋。其中有一人在信中写道：“我是一个知青，每天六点半打开半导体就开始听书。一听课，我就觉得生活有了意思，即便是喂猪的时候，也觉得生活有了乐趣。”看完之后我感动得掉泪。

60岁后的生活依然充满梦想

60岁时，我才完成了读大学的心愿。1959年，我读了大专。后来到曲艺家协会之后，其他部门的党组书记全是硕士、博士，唯独我是专科。没有进过大学课堂，我感觉人生缺了一课，所以开始继续学习。

读大学最大的困难是学习的过程。学习经济管理这门课，我一条条写下来，撕下来背。这些纸条我还一直保留着，做个纪念。我比我的教授还大两岁，他们也都理解我。每次考试坐在狭窄的课桌前，我的血压达到一百六十毫米汞柱，考完四门功课后吃什么药，血压也下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考完。

我要感恩社会，感恩同行，感恩国家。我今天的荣誉是国家给的，我一个说书人，能做的就是到基层为老百姓演出，一到基层演出，我就活跃起来。不管台下是几千人或者是几万人，我往那儿一站开始说书，底下有人听这就是给我的最高奖赏。

直到现在，我家依然保存着一张在聊城体育馆演出时候的照片。照片很清楚，很多人都围着我坐，拖拉机上、树上、房顶上也全是人。人山人海的场景通过照片都表现出来了。

如今，我年过七旬。再去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说书，和八十年代初那种万人空巷给人说书的情形相比，我觉得受观众欢迎的程度没变，我的上进心没变。

我自知夕阳已晚，还应该继续努力。

往前看，生活永远快乐、兴奋、阳光。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奚美娟

1955年生于上海，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荣获第二届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艺术工作就像头顶一碗水走路 一滴都不能洒

她成功塑造过各种不同性格命运的母亲，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国民妈妈”。她几乎拿遍了影视界所有的表演奖，仍坚守在艺术创作的第一线，她常说：“表演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看到，在你塑造的角色里，有一种文化涵养所赋予的魅力。”

误打误撞入行 最敬畏艺术的“坚守”精神

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的上海，普通话推广得还不是特别广泛。我一开始还以为上海戏剧学院就是上海戏曲学校（戏剧和戏曲两个字在上海话里是同音的），当时报考上戏，我以为是去唱京戏的，真是挺误打误撞入行。那个时代，很多学校包括中戏和上戏，可能更希望招收“一张白纸”的学生，只要你的条件比较好，有点悟性，老师就可以在你这张白纸上系统地培养你、塑造你。入学考试，我们也是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参加复试那拨人还在戏剧学校住了一星期，排了一台节目，做了一次汇报演出。当时上海好多专业剧团的人都来看，演完后又淘汰了一批人。

我读上戏时，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们非常严格。他们在传递艺术专业知识的同时，把对艺术的坚守精神也传递给我们。有

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1987年，当时我已经毕业十年了，在排演话剧《中国梦》时，因为戏剧需要，我在里面要独唱一段民歌《小河淌水》。一般舞台话剧是很难得有演员在戏中独唱的。我上戏的声乐老师看完戏后，找到我，主动让我到他家去帮我调整一下声音。那几天我正忙着办去新加坡演出的出国手续，老师就说：“你再忙，晚上演出完了也要到我家来。”记得那天演完戏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里去，他帮我调整发声、讲解中国民歌唱法。老师觉得在艺术上还应该给我提醒，希望我更完美一些，不会因为我已经毕业了，已经演了好多的角色了而改变。

有人说过，有的人嗓子很好，但让人觉得像在卖弄嗓子；有的人唱歌，一听就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我想老师应该是希望我的歌声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吧。老师在我毕业十年以后还来关注我，坚持要自己的学生做到最好的这份“坚守”，让我有一种敬畏、敬仰，对我影响非常大。现在，我也遇到一些年轻演员，有时会来跟我讨论一些关于表演的问题，我不知不觉地就会像我的老师们那样去做。表演是一门学科，需要默默执着地坚守，不是玩玩就能达到一定高度。

用心塑造角色 艺术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

我们经常说艺术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因为艺术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艺术家是要去动脑筋去研究的。艺术家要不断地把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潜移默化地演绎到角色身



奚美娟在电影《蒋筑英》中饰演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

上去。如果说演员自己就比较单薄，你的理解力就会影响到角色创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一个相对呆板的、概念的角色，而看不到太多高于生活的成分。现在的观众都非常聪明，看戏看得也多，艺术感觉也都很好，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演员的高低不同。反过来说，观众对我们演员也提出了新要求。

迄今为止，我演过五六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艺术作品。我最大的体会是，我在塑造角色的同时，也在她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相辅相成、互相作用。记得当时拍陕北“治沙女杰”牛玉琴的时候，听剧组说牛玉琴可能过两天要到联合国去领奖，我赶紧提早一天赶到陕西榆林地区的一个招待所。当天晚上，我跟她在一起住了一夜，我们面对面聊了一晚上。我觉得，她身上传递出来的信息，我是要抓住并起作用的。第二天她走

了以后，我们几个主创被她儿子用手扶拖拉机拉到她家住了一星期。我们在那里学习挖坑、种树……那些东西，都实实在在地反馈到我的创作中了。

牛玉琴的家就在沙漠里面。我们只是去一两个月拍这个片子，人家可是常年一直生活在那。演牛玉琴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感悟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文化状态”。牛玉琴在她先生去世之前，一直是跟着丈夫进山里面，进沙漠去种树，她是典型的中国贤妻良母，夫唱妇随。但当她先生去世以后，她突然间内心的角色转换了，她会毅然拿一部分自己的奖金，买羊养羊，不光是去种树。当她觉得今后要靠自己来支撑这个家、引领这个家走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她内心的角色转换了，而且是有某种精神力量在推动她的。我在拍戏时，就想着要在她身上传递一种“文化状态”，一种高于平时生活的状态。

艺术工作就像头顶一碗水走路 一滴都不能洒

塑造那些优秀女性，会让我觉得是一种幸运，看到很多、学到很多，让我得到更多滋养，也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有能力去理解这样的人了，自己再现她们的时候起码不能和生活中的她们有太大差距。如果连这个人的精神都没能力去理解，又怎么去塑造人物呢？这就是演员和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我饰演的全国第一枚“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赵雪芳大夫。赵大夫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长治市人民医院以后，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一辈子认认真真、兢兢业业。

有一天，我们到赵大夫的老家李疙瘩村拍戏。她是跟我们一起去的。戏还没拍呢，我问赵大夫呢？人家答赵大夫去看病了。她本来是来看我们拍戏的，结果当时有一位村民被炸山的飞石炸伤了，赵大夫就去给这个村民医治去了。似乎在冥冥之中，她身上有一种力量在召唤她要去救死扶伤，她这种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已经完全融入她的血液当中，融入她的人生观价值观当中。

还记得1992年的最后一天，岁末跨年时，我们到长治人民医院拍夜戏。因为要在用无影灯开刀的手术室里拍摄，只能等晚上医院下班后才能进去。当时计划要拍通宵，我就在那里等。夜里快12点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迎新年，我们却还在零下20℃的医院里待命工作，我觉得自己好辛苦啊，把自己裹在大衣里在医院走廊的凳子上缩着。当时医院里有记者在等新年第一个出生的“元旦宝宝”。忽然就听他们说：“出来了，出来了。”过一会儿，就看见医生抱出一个孩子来，这是1993年元旦这里诞生的第一个孩子。在我印象里，新生儿的眼睛都是闭着的。但那个孩子特别神奇，他两颗滚圆的黑眼珠看着这个新世界。那一瞬间，我的内心被这个新生命给点燃了。这是在我要塑造的赵雪芳大夫工作的妇产科里抱出来的孩子，顿时让我有了一种神圣感。在塑造她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努力，也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我在塑造这类优秀女性的同时，一直是有这种艺术自觉的。如果这么好的女性榜样，因为我们对她们的理解不够，或

者说简单地把她们往所谓的“高大上”去推，把生动的艺术形象弄得非常干瘪、不丰满，甚至概念化，那么老百姓看过以后就不会有感动，我会觉得这是我们的失职。我经常说，艺术工作就像头顶一碗水在走路，一滴都不能洒。有时候觉得洒一滴没关系，下面再捡回来。其实是不行的，这儿洒掉一滴，一会儿又洒掉一滴了，慢慢你的表演就不真实了。表演必须真实、真实，再真实，才能给角色填充更多丰满的东西，演员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

没有生活滋养的艺术是要枯竭的

现在的一些电视剧为了收视率，总上演亲人之间的恶斗，动不动就扇耳光、骂人。其实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冲突不一定能到这样的地步。父母也好，兄弟姐妹也好，亲人之间如果真的谁扇了谁一个耳光，造成的伤害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抚平。可是到了电视剧里，怎么就两句话一说、耳光就扇上去了呢？这不是生活的常态。

艺术作品总会对人造成一定的影响，对社会风气还是存在引领作用的。好的作品，会给观众的生活、给社会风气一种好的引领。如果说观众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看到亲情剧里扭曲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内容，说得难听一点，这就是艺术作品源于生活却低于生活了。有时候，我面对这样的问题就会很焦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明明就不是这一个样子的？艺术作品就不能站得更高一点么？



奚美娟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我们现在的创作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一个戏50天能够拍完的，恨不得20天就拍完，剧集还得越拉越长。社会生活变化那么快、那么浮躁，留给艺术家去接触生活的时间是不多的。所以演员自身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态度，要有一种文化自觉、艺术自觉，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接近生活，有意识、自觉地在生活中去思考一些人、一些事为什么会这样。在生活当中要积累自己，增强综合素质，让自己的内宇宙变得大大的、强强的，那么你才可能引领角色，或者给艺术形象多加分。艺术作品中有触动心灵的东西在，观众看了才会流泪。

艺术与生活，就像生命和水的关系，没有了水的滋养，生

命是会枯竭的。从业那么多年，我就觉得生活太大了，自己个人太渺小了，所以必须要热爱扑面而来的生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无愧于时代的力作来。

沧海桑田 魂牵梦绕我们的“中国梦”

我于1987年首演话剧《中国梦》，到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在当时的出国潮中，不少人曾表明以后不会再回来了，连继承权都要放弃，采取一种决绝的态度去拥抱美国梦。实际上到了美国以后，自己国家开始改革开放，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发达。话剧《中国梦》就是当时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写自己魂牵梦绕的中国梦，由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导演。这个戏演出后非常轰动，后来还参加了中国首届艺术节，我因此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中国梦》是一个被认可的作品，几轮演出完了以后就不演了，我一直觉得挺可惜的。后来，这部戏的剧作者从美国回到上海戏剧学院当了教授。去年，他把这部戏复排出来，给毕业班做毕业大戏演出，还请我去和现任年轻女主角交流，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开心，现在的表演形式和我们当时又有很多的不同。我觉得，一些经过锤炼的好剧目，应该作为一个经典保留下来，然后让一代一代的演员来演，那它就传承下来了，对于年轻演员的锻炼也是很大的。

如今，我们讲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和80年代初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梦想，是不谋而合的，这之中实际上也隐含着一种传承。中国梦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要为实现这个艺术繁荣的中国梦、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孙立军

1964年10月生，河北保定人。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

振兴民族动画的快乐奔跑者

他是中国动画事业的拓荒者，作品影响了中国一代动画人，一部《小兵张嘎》几乎拿遍了国内外各种动画电影大奖。他是中国动画教育的领军人，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动画学院，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动画人才。他支持保护国产动画，鼓励国产动画走出去……

让国产动画有品位有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国产动画领域面临很多挑战。这些挑战让我不敢放松，促使我完成第一部北京自产动画电影、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国产动画影片——《小兵张嘎》。从1999年开拍到2005年完成，用6年时间制作、打磨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电影，我认为是值得的。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也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剧组资金紧张，北京市委宣传部、电影局等单位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小兵张嘎》的声音合成期间，于蓝、郑洞天、姜昆、李琦等演艺界知名人士纷纷义务配音，不拿分文。

对影片的主人公张嘎，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定位。张嘎是中国几代人心中的英雄，如果剧本改动得多，观众难以认同。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避免了许多鲜血场面和暴力镜头，同时加入了很多时尚创作理念，让嘎子的形象质朴、可爱、

机智、勇敢，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此外，我还拍摄第一部贺岁动画电影《欢笑满屋》，第一部运动题材动画电影《快乐奔跑》，第一部数字动画电影《巴特拉尔传说》，第一部动画武侠类电影《兔侠传奇》。其中，《兔侠传奇》这部动画片卖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动画中的原型来自于京津两地的民俗符号，将中国功夫融入其中，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主要表现了中华民族讲诚信、重信用的价值理念。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是中国动画电影走出去的“独门绝技”，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我们动画人为国产动画发展奋发作为的同时，国家为保护国产动画片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比如，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电视台黄金时段限播境外动画片”的规定。那个时候，我国真正从事动画的人很少，只有一百人左右，而现在有几十万人。如果没有这个政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十万人有80%要失业，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优秀的动画作品，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上星的动画频道。作为专家代表，我支持这个政策，不仅是因为发展国产动画能够带动一批动画产业人就业，更关键的是动画片有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传播性。发展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动画产业，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未成年人特别是学龄前孩子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使他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陶冶情操，提高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一代代人担起振兴民族动画的使命

回顾多年从事动画行业的经历，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上大学前，我对动画并不了解，但是通过学习并留校任教，我爱上了这份职业。

做学生时，我最难忘的老师是阿达，动画片《三个和尚》的导演。他是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我们面前去世的。他去世以后，我感觉自己一夜之间长大，我把被褥搬到教室，夜以继日地学习，告诉自己一定要把专业学好。

北京电影学院刚设立动画学院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几位老师，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电影学院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作为当时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我深感担子很重。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到北京电影学院视察，点名要参观动画学院。岚清同志说：“我们中国为什么做不出《狮子王》？你们一定要把好作品拿出来。”我深知总理是在为我们鼓劲打气，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举国之力创造很多奇迹。但我同样深知，动画不是有钱就能做成的，它更需要优秀的人才，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

当时，日本的动画片以一块钱一分钟卖给我们，而我们自己国产动画的制作成本要五六千块钱一分钟。单从商业角度上讲，我们的动画片完全没有竞争力。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做了吗？我反倒深感责任重大。国产动画的振兴崛起，不是我一个人拍一部《小兵张嘎》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如何在条件艰



孙立军以骑行方式鼓励女儿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18岁，18天》

苦的条件下坚定信念、努力工作、大胆创新，带出更多优秀的人才。这份责任心，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强烈。

我当老师以后，动画专业发展很快，原来只有几十个学生，后来发展到四五百人。一天，有个学生请我去看他们团队的作品。他们的工作间堆了很多杂乱的东西，光可乐瓶就有几十个，我当时就批评了他们。但看完他们的作品，我心潮澎湃。通过作品，我看到了这个团队的情怀，看到他们对动画的热爱，也似乎看到当年自己的影子。我告诉他们：“你们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心爱的动画片，非常棒！”出来以

后，我心里很愧疚开始的时候批评这些学生。他们不分昼夜赶制作作品，那么长的动画片一般动画公司都很难完成，但是他们却做得很好。这些学生就是未来的艺术家、未来的大师。后来，这个作品在动画学院引起一片好评，在韩国等国家放映，也有不错的反响。

还有几部学生的作品，我们动画学院的老师带到欧洲去学习交流。有个老师非常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美国迪士尼的奥斯卡评委评价咱们的作品，说困扰大学艺术和商业二者矛盾的难题，被东方的北京电影学院解决了。他们评价咱们的作品，既有艺术性也有很好的商业性。”听到这些，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成功，但是学生的作品成功了，某种程度上比我自己的成功意义更大！

我常对动画学院的毕业生说，我们不担心电影学院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忧虑是教出来的动画工作者没有道德底线，生产一些文化垃圾。希望每个学生都是一名战士，替我们国家在动画领域打好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

用动画传递爱

今天，我们常常讨论人要有精神食粮，但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高寒地区，人们过冬连件棉衣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去想精神食粮？因此，我觉得为那些边远贫困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关爱都很必要。最近，我的

一幅作品在网上公益拍卖，拍卖的全部所得将捐给基金会，去救助需要救助的儿童。我打算每年暑假利用20天的时间，为贫苦边远地区的人们做些事情，希望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我现在想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更多的人，哪怕一生中只做一件对他人有益的事情。13亿人，积少成多，一定可以把爱传递出去。

通过行动向社会传递爱心的同时，我也想向家人表达永恒的爱意。我和我爱人工作很忙，女儿出生5天，我母亲就把照顾孩子的重担接过去了。孩子2岁就被送到幼儿园，一晃18年过去了。有一天爱人跟我说：“过两天学校要举行一个成年礼，是女儿的最后一个家长会，你去不去？不去就没有了。”我突然意识到，平时工作忙忙碌碌，对孩子的关心很少。成人礼上，我如坐针毡，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出来以后，我在马路上泪流满面，百感交集：第一，真的怕失去女儿；第二，担心女儿认为我不爱她；第三，不知道怎样向她表达自己对她的爱。于是，我想送她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利用暑假的时间骑车到上海。让女儿看到，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时是如何度过和克服的，同时也想让她知道爸爸妈妈是爱她的。我想通过自己这样的特殊经历，拍摄一部电影，让更多的孩子了解，父母是永远深爱着自己子女的。

为做好这次骑行活动，我开始了训练，期间还去参加了一个比赛，从车上摔了下来，鼻子缝了4针，手关节错位，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女儿高考结束以后，我让她给我十八天，每

一天代表她的一岁。这十八天里，我沿路给留守儿童放映我的动画片，我想通过这种行动告诉女儿，我们国产的动画片是很受欢迎的。一开始，女儿觉得我是在自虐、自恋，因为我血压高，身体并不是很好，但我想既然决定了就要实现。当时沿路上遇到很多好心的骑友，有的骑友骑行20公里提前接我，第二天又送出我10公里。后来，我把在沿路拍的视频放给女儿看，女儿泪流满面，自己跑出去哭。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女儿真的懂事了，她知道父亲是爱她的，她也知道要承担一份责任。这件成人礼，一开始只是由一个小家庭引起的，但当我们共同完成之后，我认为可以唤起更多的年轻人，早一点成长起来。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苏小卫

笔名思芜、秋实。著名电影编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作品多次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本人也多次荣获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编剧。代表作品有《那山那人那狗》《暖》《沂蒙六姐妹》《唐山大地震》《萧红》等。

打动观众的一定是真善美

她曾是北京郊区房山师范学校的老师，在简单平静的日子里，从没忘记自己的梦想；她是用心笔耕耘的编剧，多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作品越接近人物本身才能越接近观众

我写电影《赢家》缘起于天津田径运动员孙长亭的一场报告会。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孙长亭受伤失去了左腿，但他没有躺在军功簿上享受国家抚恤，而是刻苦锻炼，成为一名出色的田径运动员。他共获得5枚金牌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虽然命运对他很残酷，但他在讲述经历时，却带着一份轻松，那种坦然与坚定深深打动了我。创作，就是要写这种牵动人心的东西。

我出发去天津找孙长亭。那天下着大雪，我坐着长途车到了天津。当时，孙长亭在经营一个假肢公司，我跟他的员工们聊天，大家抱怨他经常不要钱就给人家装假肢。我向他求证，他说：“有妈妈带着儿子来了，有的就提着一兜馒头，他们没钱，我怎么忍心拒绝？”

与孙长亭的沟通中，他最常说的两个字就是——不服。残疾了，难道就不行了？残疾人也能有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回京

后我便开始了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在犹豫，如果这个剧本还像通常写模范人物的套路一样，写主人公如何训练、如何吃苦、如何遇到挫折不放弃，就离观众有些遥远，因为孙长亭的经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于是，我决定不完全按照孙长亭的成长经历叙述，而是选取一些故事点，再加上一些戏剧特有的矛盾冲突，最终写出了《赢家》。结果，这一人物形象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同、理解和接受。

真实的生活永远大于编剧的想象

刚开始接到影片《沂蒙六姐妹》编剧任务时，我是推辞的。因为我对过去的事情不了解，但王坪导演再三邀请，我便硬着头皮接下来。写完以后，心里有点虚，因为仅从网上了解一些背景资料就写了剧本。王导看完剧本后对我说：“走吧，咱俩一起去沂蒙山看看。”

在沂蒙山待了一个星期，我暗自庆幸这趟来对了，并对之前写的那个故事和写作态度感到惭愧。在那里，我接触到了“沂蒙六姐妹”的原型，老人们的身体都很好，她们常给年轻人讲过去的事情，用亲身经历给人们当“活教材”。虽然不能再回到战争年代，但重新回到故事的发生地，尤其是见到人物原型后，对历史的敬畏感、对人物的尊重感油然而生。同时，我还听到一些编不出来的故事——六姐妹中的一个女孩临结婚前男朋友上前线了，女孩的嫂子抱着公鸡跟她拜堂，她在家苦等丈夫回来，可得到的却是丈夫在前线牺牲的消息，剩下的

岁月，她就陪伴着男方的父母，度过了一生。这样的故事不实地了解是编不出来的。

在走访期间，我还接触到一位部队首长。当年因为南征北战，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一位老乡照看。老乡把首长的孩子一直抚养到新中国成立后。孩子长大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但这位首长觉得对不住老乡。当他得知老家有个女儿和自己儿子关系不错时，便决定把儿子送回乡下，跟老乡的女儿结婚。首长觉得这样做，才心安。这样的故事，生活中还有很多，只有用心融入生活，才能发现好素材，提炼出好故事。

回到北京，我把采访到的故事，与以往沂蒙山六姐妹的事迹对应起来，编在一起，写出了一个新的剧本。我慢慢悟出：编剧不能太自负，不能太轻浮，不能闭门造车、乱编乱写。写出一个剧本容易，但是写好一个剧本却很难。

编剧也能在故事中积累成长

再说说创作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事情吧。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代正好和我的成长时期吻合。1976年，我十多岁，虽然不在唐山，不是一个亲历者，但是北京同样也经历那场地震的波及，我也在抗震篷里住过一段时间。怎么在电影中把唐山大地震这么一个事件装进去，需要一个切口。张翎的小说《余震》就有一个很好的切口，从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他们经历灾难之后的改变开始，于是我有了改编的底气。但是，写作的时候又不能完全按小说写。原小说有很大部分内容是在国外，是以



苏小卫生活照

女儿出国后的生 活为主线，但是制片方希望把《唐山大地震》写成一个亲情故事、一个回家的故事、一个修补亲情拯救内心的故事。所以我写作的时候就得把国内这些人物的命运写进去。于是，我就去唐山采风体验生活。很多内容我很熟悉，比如高考、下海、大学校园生活、孩子和家长的关系等，有了生活积累，对人物的设计、台词写来就容易得多。

电影中的儿子学习不好，妈妈特别着急，在给他姐姐和父亲上坟烧纸时，妈妈就念叨儿子让她失望，而儿子脱口而出：“你当年还不如救我姐呢，就我姐乖，我姐学习好。”这话触动了妈妈内心最不能触及的地方，就回手打了儿子一巴掌。另外，剧中的女儿怀孕了和男朋友争吵，男朋友说：“你还没读

完大学，当然应该做人流。这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都是学医的，不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他就完全不能理解女孩为什么犹豫，但是从女孩角度，她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死里逃生，她心中还有一个被她妈妈二选一时放弃而无法忘却的伤痕……

剧情中的这冲突，看起来是剧烈的、大胆的，但背后却体现了编剧对生活、对人物的把握能力。刚开始我觉得这事特大特沉重，慢慢地可能就会觉得这事不是不可以沟通商量的，不是找不到办法解决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也没有那么难，只要大家别那么计较，别那么紧张，放松一点，很多事情也都是可以做好的。每个故事的创作，每个情节的设置，其实就是编剧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我自己也在故事中不断成长。

最打动人的一一定是朴实善良的本性

电影《愚公移山》拍摄前，制片方找到我，给我讲太原钢铁厂“现代愚公”李双良的故事，希望我写出来。80年代，太钢冶炼的废渣都是倒在厂后渣山，山越堆越高，后来，只能修一条铁路到山顶，开着小火车倒废渣。春秋刮风季节，整个后山都是漫天渣土。退休工人李双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与厂方签了份十年承包合同，要移走三个天安门广场大的渣山。李双良雇民工用小板车拉土，从渣山里挑铁块卖了付工钱，就这样小打小闹地干着。后来，李双良发现废渣还能做水泥、烧砖块，就办起了加工厂。七年不到，渣山移走了。过了几年，太钢的人告诉李双良，他的渣山估值有2个亿，按照当年合同中



苏小卫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10% 的报酬，可以给李双良2000万元。可李双良却拒绝了这笔钱，他认为当年挖渣山那么多人干活，自己不能拿这钱。

这个故事特别感动我，我去太钢见到了80多岁的李双良。他神情淡定而慈祥，那种忠厚、善良和大气是劳动人民和产业工人独有的气质。走访李双良的过程中，两个细节很打动我，我们坐一圈开会，他想上厕所，但腿脚不利落，就绕了一大圈躲摄像机走；儿子发言，他怕儿子说的太长耽误时间，就冲儿子做手势、对着话筒吹气，意思少说点。从他的举止和言行中，我能感到他一定特别幸福，他的幸福不建立在钱和地位上，而是来源于他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坦荡感和认真做事情的成就感。

电影要传递主流价值观，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艺术的追求和责任就是传播真善美。今天，艺术多样化也好，边缘化也好，个性化也好，甚至是强调自我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最打动人心的，还得是真善美。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六小龄童

本名章金莱，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西游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个国家的文化友好使者，曾获加拿大“杰出华人艺术家”称号。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者”

他出生于猴王世家，自幼学艺，是戏曲艺术大师六龄童的幼子，章氏猴戏第四代传人，因为在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扮演孙悟空被亿万观众熟知；他致力于传播传统猴戏艺术，在国内演讲800余场；他作为中华文化传播使者，将优秀传统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接过猴文化传承的“金箍棒”

中国的猴戏艺术源远流长、百花齐放，各个剧种都有优秀的艺术大师。光京剧就分南北两派，北派猴王有杨小楼先生、李少春先生、李万春先生；而南派猴王，则有盖叫天先生及他的几个孩子、郑法祥先生和我的父亲六龄童。

我小时候，父亲每次登台演孙悟空，我们十几个兄弟姐妹就会被画上猴脸演小猴子，父亲一边演出一边观察，看哪个孩子更有潜质，能挑起未来的大梁。二哥章金星在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里是最出色的，他三岁学艺，八岁就和父亲出演了绍剧《大闹天宫》。当时周恩来总理还在舞台上接见了他，并给二哥赠名“小六龄童”。二哥十二岁时还参与拍摄了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可以说很早就成名了。但很遗憾，二哥1966年患白血病不幸去世。他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我这个小



六小龄童在1986版《西游记》中饰演孙悟空

弟弟能替他把家族事业继承下去。于是，我责无旁贷地从他手中接过了“金箍棒”，延续哥哥的艺术生命，走他没有走完的“西天取经之路”。

1982年，中央电视台要拍摄电视剧《西游记》，父亲将我举荐给了杨洁导演，出演孙悟空。刚开始我也不知该如何演，因为在孙悟空角色塑造上，我既想保留中国传统艺术中对孙悟空的诠释，又想塑造一个接地气、生活化的齐天大圣。为达到这一目的，我想了很多办法。我把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各种版本猴戏，甚至包括卡通片、皮影戏、木偶剧等都研究了一遍，最后创造出了大家看到的这个美猴王形象。后来这部电视剧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几十年来在国内各大电视台播出了3000多遍。曾经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有的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观众都没有记住；有的演员演了一部戏，让我们记住了一辈子。”我听后很感慨，我不是第一个演孙悟空的人，但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才有这样的机会集猴戏之大成。同时，我也体会到，人一生能认真、坚持做好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吴承恩先生用一生的心血创造了一部伟大的作品，玄奘大师历经劫难践行他“宁向西去一步死，不往东归半步生”的誓言，他们用尽全力去做了一件他们认为值得的事情，而我这一生最应该做的，就是把猴文化传承下去。

打动人心的作品首先要“走心”

上世纪80年代，电脑特效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是包括导演、编剧、演员在内的所有主创信念都很坚定，不拍出一部好剧不罢休。86版《西游记》拍了六年，所有特技动作都是靠演员独立完成。为什么不用替身演员？一方面，孙悟空的“飞”，不仅是一个飞的动作，里面还要有表演。因为不像一般的武侠剧，演员远远地飞出去就可以，孙悟空要先有造型再起飞。比如，看到前面有棵大桃树，孙悟空得演出高兴的劲儿，再回头看看唐僧说：“师父，俺老孙前去看看，”接着才能飞走。替身演员毕竟不是专业学猴戏的，演出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所以必须自己去完成。另一方面，有的戏确实有危险。当时我23岁，替身演员也就20来岁，没办法让别人替你去冒险。像拍“大战红孩儿”那集，要拍孙悟空被火烧的镜头，我在里面穿了一件石棉的衣服，外面套上孙悟空的戏服，做了简单的隔热保护就准备开始。开拍前，杨洁导演说，过程中你坚持不了就赶紧说，或者觉得危险我们也可以不拍这个镜头。但为了效果，我还是坚持上了。那场没有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戏份，他们三人就在旁边拿着棉被、铁铲和水桶，准备随时灭火。导演一喊开始，火烧了起来，我瞬间感觉到了烈火攻心，烟慢慢浓起来，我觉得快要窒息，风一吹，火苗一下子就把脸上猴毛、睫毛烧着了，孙悟空的脸都烧变形了。而整个过程，我却得表现出孙悟空从满不在乎、觉得自己不会被烧，到最后真不舒服的整个

过程。整场戏我咬着牙演完，导演一喊停，我立马滚倒在地，师父师弟们还有工作人员赶忙帮我扑火。当时我已经被呛到窒息，有点失去知觉，随组的医生给我吸了氧气，才慢慢苏醒，当时真体会到了人被烧死前的感觉。现在想想，那会儿我们都是这么拼的。

当时整个《西游记》剧组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投入，就是想打造出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经典《西游记》。现在高科技比以前先进很多，但观众反而觉得有些版本的《西游记》很假，孙悟空不像孙悟空。我认为，主要还是演员没有接受过中国传统戏曲猴戏表演的训练，孙悟空的情绪是通过手、眼、身、法、步去传递的，都要靠演员去表现，没有长期积淀的演员是很难表达的。我们学猴戏都要先从模仿真猴子的一举一动、一缩一站开始，再在实际表演中去体会“真猴子”的感觉。比如，猴子挠痒痒经常是下意识的，但是这个“挠”也有不同：生气了，反着挠；高兴了，顺着挠。所以在表演时，孙悟空的每个细节都要根据场景的不同，做不一样的处理。演员是整个剧的灵魂，而高超的技术特效是为内容服务的。艺在先，技在后，不能喧宾夺主，如果观众看完《西游记》记住的只是震撼的高科技特效，这个戏就歪了。

中国观众是最好的观众，也是最难对付的观众，他们不会因为你红了，因为你是名演员就无条件支持你。再好的演员拍出一部烂片，一样会遭到观众的排斥。只有心里要装着观众，用诚心创作出的艺术形象，才能打动观众。

艺术作品不能只要市场而没有“底线”

有人说市场决定一切，但对于文化艺术来说，却不是这样的。以前有电影投资方说，一部电影就是二三十天的经济效益，之后成了“文化垃圾”也无所谓。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过，我们现在的文艺作品，有高原，但缺少高峰。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结合，首先要重视社会效益，第二才是经济效益。这些话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艺术作品不能只看到市场，票房、收视率不是唯一的标准，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基于传统文化的创作，可以创新，但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恶搞，甚至亵渎。在有的影片里，孙悟空跟白骨精谈起了恋爱，小朋友问我：“美猴王叔叔，孙悟空在取经路上有几个女妖朋友？”每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心在流血。

我曾说过一句比较重的话：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是可怕的，有了文化不去弘扬是可悲的，践踏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可耻的，我们没有戏说和糟蹋名著的权利！

要将“美猴王”精神传播到海内外

去年10月，我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一一握手，到我这里，总书记非常关心地问：



六小龄童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你最近在拍什么戏？”我说：“还在拍《西游记》。”当他得知我这次是与好莱坞合作，拍摄两部《西游记》电影时，他说：“拍两部少了，《西游记》是世界名著，可以拍很多部，要通过这样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让中华文化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总书记的话一直鼓励着我，我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这些年，我也一直致力于在国内外传播猴文化、戏文化。我除了写一些表演艺术的书以外，还写了一些西游记的读物，有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听孙悟空说西游》，给成年人阅读的《六小龄童品西游》。同时，我到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去给学生面对面讲演，主要传播西游文化、猴文化，截至目前，已经做了800多场演讲，希望到明年猴年可以做到1000场。我把演讲也做到了海外，希望孙悟空能成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使者。最近，我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提到了电视剧《西游记》在越南的影响力。今年5月，越南国家领导人阮富仲曾在我的《六小龄童品西游》越文版书上签名、题字。我想，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都喜欢孙悟空？主要因为他身上这种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精神。同时，在孙悟空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智慧之处，比如他对待妖怪不是一棍子打死。对一些神仙的坐骑、门童、宠物，他会找到主人来收复，对一些可以挽救的小妖，他也就笑笑而过。他身上的这些精神和智慧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的。

借北京、张家口将要举办2022年冬奥会之机，我有一个打算，想向组委会推荐“美猴王”作为冬奥会的吉祥物。很多奥运的吉祥物都是动物形象，孙悟空既有动物性，还有传奇性和社会基础，同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希望能借助奥运之机，借助“美猴王”这个大家喜欢的形象，将我们中华儿女勤劳、智慧、勇敢、爱憎分明的形象传播出去。

如果说我前半生是在传承中国猴戏艺术，那么后半生我则是要弘扬美猴王精神。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相似之处。我在央视节目《开讲了》上说过一句话：人的一生就是苦练七十二变，笑对八十一难。

“七十二变”是个人的本事，“八十一难”则是人要经历的困难。“七十二变”是立身的本领，“八十一难”则是处世的方法。《西游记》的故事和哲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以此去和观众沟通，去和外国友人交流，就是对中华文化很好的宣传和弘扬。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叶辛

1949年生于上海，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

好的作品应该写在人民的心坎上

他是知青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作品深入刻画了一代“上山下乡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三十多年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记忆时代却又感动时代的优秀作品。

十年知青生活是人生宝贵经历

46年前，我19岁，从上海到贵州农村插队。虽然我对这个5000里外的地方做了各种思想准备，但到了那，还是觉得自己准备不足，艰苦的条件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举三个细节：第一，住的是泥墙茅草屋，没有窗户，我们在墙上凿一个洞，在洞里嵌一块玻璃就是窗户。男知青还好，女知青生活很不方便，泥墙茅屋干裂以后，裂出一条条的缝，她们只能将报纸塞在缝隙里，再贴一张报纸来阻挡墙面透光。第二，上海是一个平原城市，几乎没有山，云贵高原就不一样了，有句话叫“开出来就爬坡”，随时要准备上坡和下坡。我们每天干完活，不管男女都要扛着锄头走很长的山路，而这对于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细节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当地有句俗话叫“贵州人怕不辣”，在几个吃辣的省份中最不怕辣的就是贵州。初到贵州，跟当地老乡说做饭不要放辣椒，结果炒出来的菜还是辣的，老乡说不放辣椒他就不会做菜。由于

水土不服，很多人皮肤都长出黑块，很痒。刚去的第一年最厉害，春、秋季节高发，到了第二年稍好一些，三到四年才能消除。

我在贵州农村插队一共10年7个月，从最开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结束我都经历了。那十年的蹉跎岁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10年7个月是我人生一个宝贵的经历，我的作品如《孽债》《蹉跎岁月》等都与这段经历有关。

用作品呈现历史、警示后人

在写《蹉跎岁月》这部长篇小说时，我有三个想法：一是想通过这部小说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二是想写出不同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三是这段岁月虽然过去，但希望我们能正视并认真对待，汲取教训留给后人。小说出版和电视剧播出后，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我想原因就是作品反映了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思考。

对于此，我自己有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们公社有位知识青年，表现非常好。我们每天劳动有一项工作是做砖坯。像我这样的劳力，一天从早干到黑能打80块砖，一般农村劳动力能打300多块，300多块可以得12个工分，而这位青年一个人从早到晚能打600多块，说明他是非常用心在做事。每次厂矿招工人，我们大队书记都会把他推荐到公社，但每次到县里就会被退回来，前后退了3次。后来，大队支书不服气，带他到县知青办问个究竟，得到的回复竟是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这让这位青年



1970年叶辛在插队落户时摄于贵州，
这张图片后用作英文版《孽债》封面。

很压抑苦闷，一天要抽两包烟，搞得手指都熏成了蜡黄色。

人们对当年那段知青岁月的回忆有说青春无悔的，有说青春有悔的，有说整个青春都荒废的，我都能够理解，而且我觉得都特别真实。当年知青大约有两千万人，怎么可能要求这两千万人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但在那段艰苦的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要生存下去，这是对这一代人的磨炼。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无论是后来从事了什么职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相信都能够坚强地面对。

我前后写了十本和知青有关的书。2008年，天津白话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叶辛知青作品总集》。知青这段岁月虽然过去，但是我想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知青”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初衷。

作家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我写过一部反映农民进城务工的小说叫《问世间情》，主要讲的是上海农村进城务工者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我最早关注

这个社会现象是在1998年。先在广西南宁，后在广东，再后来在上海近郊，我都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哪怕到了现在情况依然存在。农民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就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之前关注农民工更多是从经济层面来看，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农民工收入提高了，天天接触的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大城市的生活圈子，肯定也是会羡慕城市生活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肯定也会有个人精神层面的需求。

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让我开始着手创作关于他们的小说。但是真正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就碰到了麻烦。因为我不熟悉这个群体，要写好他们，就要走进这个群体。后来我深入到一个合资工厂里，和工人们交朋友。在那里，我和工人一起在食堂吃饭，还去了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收入不低，最低工资每月有三千多，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8个小时，收入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的感情世界、精神需求却存在无法弥补的空白。

《问世间情》这个作品所反映的临时夫妻现象，应该算是一种灰色婚姻，介于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之间，介于应当和不应当之间，存在合情的可能但又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们不但希望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也有更多的精神需求。社会应该考虑到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在写《问世间情》的时候，我就希望能通过我的笔触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关注到农民工除了物质以外的精神需求。文艺工作者处于社会舆论的前沿，反映基层民众的呼声，我们艺术工作者责无旁贷。

好作品能让社会变得温暖

去年，我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提出了要求：“作品是立身之本，文学创作者应该静下心来精益求精地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我认为，习总书记提到的“人民”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要带着一颗热爱人民的心深入到生活当中，怀有深切的感情对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对待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农民工群体，想他们所想、视他们所视，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创作出人们喜爱的文学作品。

要接触生活中的真实，不是说你到城中村去走一遭、到工人当中走一遭就能了解的，你需要长期深入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才会把故事告诉你。记得，我的小说《问世间情》里写到一位24岁的小伙子住的是200元一个月的房子。当时有位同志给我提意见，认为现在上海没有200元一个月的房子。其实，他不知道，城中村里很多房主，自己搬进了楼房，就把老房子分成200元、300元一个月的小间租给单身打工者。这个细节如果不真正深入到生活中是根本不能发现的。

好作品永远来自人民当中。优秀作家应该是将作品写在读者的心上，用自己的感受去体验生活、亲近生活，发掘出能够让我们这个社会感到温暖的东西，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是好作品。



谭利华

1955年10月生于江苏徐州，国家一级指挥，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用交响乐为人们 打开一扇心灵之窗

他是国内外享誉盛名的指挥家，艺术足迹遍及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曾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国外一流乐团；从1994年开始，他致力于交响乐普及工作，孜孜以求、坚持不懈……

从艺40多年坚持做“有温度”的音乐

我16岁时就在军队文工团当乐团指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上了中国最早开设西方音乐专业的上海音乐学院。当时我学了两个专业：作曲和指挥，半年后我放弃了作曲专业，专心学习指挥。非常幸运的是，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师从李德伦先生。李德伦先生是中国当代交响乐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人品、人格、艺术态度，让我一辈子都学不完、用不完。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交响乐的普及。交响乐能让人学好，能让人变得有追求，能给人一个新的平台，为人打开一扇光明、美好的大门。记得他曾给我看过一封信，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在听完他指挥的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之后写给他的。信上说，感谢李先生给了他一场那么美好的音乐会，让他不再有轻生的念头，他本来因为无力面对人生困难，很沮丧、

想自杀，但听完《悲怆交响曲》后，觉得人生虽有很多苦难要面对，但应该有坚强的意志，生活和生命还是美好的。这件事情让我触动很大，从那时起我更坚定了学习古典交响乐的想法。

从业40多年来，我的想法始终未变。我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这些能够产生正能量、催人向上的音乐。我不苛求一场音乐会能有几百人、上千人来听。几十人能来，甚至几个人能听懂，我觉得都是一种慰藉。因为人们需要音乐的滋养，尤其古典音乐中饱含着一种特殊的爱。交响曲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曲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它所折射出来的思想就是全人类一体的思想，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像兄弟一样团结。这个作品我们经常演，到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在像德国这样的交响乐发源地还是在交响乐起步较晚的亚洲地区，不管是在国家的重大节日还是在奥运会等国际盛事，每演奏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因为它所传达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相通的。爱，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爱，能让人们战胜任何困难；爱，能让世界达到更美好的境界。

艺术不能“炫技”而要“走心”

中国的交响音乐起步较晚，目前大家比较熟知的国内交响乐团有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而北京交响乐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乐团，成立于1977年，虽然年轻，但这些年的发展和进步却非常之大。



指挥家谭利华沉醉在音乐中

北京交响乐团从建团开始，就有三条理念贯穿至今：第一，要建立一支和首都地位相称的优秀交响乐团。优秀到什么程度？要像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巴黎管弦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等这些世界发达国家的首都交响乐团那样，成为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要配得上“首都北京”这几个字。第二，要肩负起中国原创交响乐的创作和普及任务。每年我们都会邀请中国优秀作曲家创作很多具有“中国味道”的作品。近几十年是中华民族发展最迅速的几十年、最令人不可忘记的几十年，我认为，音乐是记录这个时代发展最好的载体，我们应该为这个时代留下点什么。我希望再过若干年，大家回忆这个时代的时候，能记起有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些优秀音乐作品。第三，我们要大范围地演奏、传播中国的优秀交响乐作品。音乐是你越熟悉就会越喜欢，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小

提琴协奏曲》《黄河钢琴协奏曲》，听多了大家就喜欢了。

最近，在主持中国音乐金钟奖比赛时，我讲过一句话：“当代作曲家们写出来的作品应该有人愿意演，更有人愿意听。”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接地气”。这些年，很多人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强调所谓的“技术含量”，但我希望音乐作品不要“炫技”，而是要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去年我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他特别列举了四位西方作曲家和他们的一些音乐作品，贝多芬、瓦格纳、比才、柴可夫斯基，虽然他们都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的音乐大家都能接受和喜欢，这就是古典音乐所传达的一种“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共鸣能陶冶人的情操，能够将人的内心软化。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管战争如何频繁，但他们仍然有联合的交响乐团，也许他们正在打仗，也许他们对待问题的看法不一，但两国的音乐家们仍然可以抛开芥蒂坐在一个舞台上，演奏同一部贝多芬的交响曲。这种境界、这种大爱，才是音乐真正的内涵和魅力所在。

让高雅艺术在校园“扎根”

从70年代开始，李德伦老师就带领北京交响乐团走进很多大学。北京交响乐团举办的“交响乐进校园”活动，应该是全中国交响乐团中做得最早的。2015全年，我们大概做了40场进校园活动。每次到各个大学去，学校里的书记、校长都会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对欣赏古典音乐，好像没有那么浓郁的兴

趣，挺让人着急的。我说，不必着急，欣赏音乐就像吃菜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对音乐艺术的喜好也有不同，有人喜欢流行音乐，有人喜欢乡村音乐，也有人喜欢摇滚音乐。欣赏交响乐也是这样，不用逼着大家喜欢，只要大家能够走进音乐厅、静下心来欣赏就可以了，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会逐渐爱上交响乐的。

为普及交响乐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一开始，我们去学校发票，只要有学生证就可以免费观看。后来，我们觉得培养孩子学习交响乐的兴趣更为重要，我们与中小学合作，成立了管弦乐队、交响乐队，像北京中关村实验二小等小学都有自己的乐队。同时，通过组织孩子们演出，他们的同学、家长自然就会走进音乐厅来听听音乐会、看看演出，这样也是一种推动、一种普及。

我们还在不同的大中专院校有针对性地进行演出。比如去北大、人大一类的高等学府，我们会演奏一些像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的交响曲。去理工类的学校，我们就演一些大家听得多、耳熟能详的管弦乐。每次演出的过程中，我们都会一边演一边介绍交响乐的知识，告诉大家这首叫序曲，这首叫舞曲，而舞曲又分成圆舞曲、波尔卡舞曲等，让他们通过一个音乐会，更多地了解交响乐。同时，我还会告诉同学们，交响乐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不同性格的人可以欣赏不同类型的交响乐。如果你喜欢热闹，可以听听舞曲、听听波尔卡、听听序曲、听听圆舞曲；如果你喜欢安静，

可以听听马斯奈的冥思曲、乡村骑士间奏曲这一类的音乐，它们能让你不由自主地静下来。因为某一句旋律会让你产生画面感，让你联想到儿时的、以前的、朋友间的、亲人间的画面，这就是古典音乐的陶冶功能。

我去过古典音乐家布鲁克纳的故乡——维也纳，每年那里都会为布鲁克纳举办世界音乐节。但音乐会的观众都是50~70岁的人，我就问外国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人大概在年轻的时候都比较浮躁，当年纪大了，沉静下来以后，才会在交响音乐、古典音乐中去寻找自己的过去，来回忆、来想象。我告诉他，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现在很多年轻人渴望了解古典音乐文化，愿意听听真正的交响乐。这现象有别于西方，这也是我认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大有可为的地方，同时也是这么多年我一直致力于交响乐进校园的初衷。

带着中国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走出去”

近年来，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但是往哪走？怎么走？带什么走？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有时候我们花很多钱搞个活动，灯光布景眼花缭乱，最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这种走出去的意义是不大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的中国文化年开幕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出席，他带来的演出是一台俄罗斯原创的芭蕾舞、一台交响乐和一台歌剧。照理说，俄罗斯有最好的马戏、有最好的流行音乐、有最好的民俗技艺，但他都没有带，而是带了歌剧、交响乐和芭蕾舞，这让我很震惊。

为什么？因为这些能代表世界的主流文化，能代表这个国家、民族的最高艺术成就。这给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不应该是一味迎合国外观众的大众审美，而是应该吸引国外的主流观众来看你的演出、听你的音乐。

从2001年到现在，我们七次出访欧洲，从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等这些国家我们都去了。一开始西方观众对我们的演出不太接受，于是我改变了做法：演出的上半场我坚持演中国最优秀的作品，去展示当代中国交响乐文化的实力和魅力；下半场我一定选择西方经典音乐中最难或最有影响力的交响乐作品，让观众明白我们的乐团是一个什么水准。一开始西方观众不太接受中国的音乐，因为他们听惯了西方的音乐。但是到了2005年我们第三次演出时，西方观众已经对我们认可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实力让他们大为惊讶。他们知道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贫困、弱小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大国，其交响乐的演出标准也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我们不仅能精准演绎出西方的经典音乐，还能用中国的音调和元素，借鉴西方的技法，创作出中国人的交响乐。

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定是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要带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出去，无论是音乐、戏剧或者舞蹈，要真正能够代表当今中国的最高水准，这样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欢迎和尊敬。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刘劲

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演员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志愿者协会理事。曾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大奖，荣获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和第二批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称号。

用生命和热爱演好周总理

他，出生于四川阿坝州，为实现演员梦三次参加艺考。他，二十多年里扮演周恩来总理六十余次，独特的表演风格堪称经典，赢得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默默许下演员梦 不达理想誓不回

我的父母是50年代四川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响应党中央支边号召，毕业后去了四川最偏远的阿坝州。我出生在阿坝州的州府马尔康市。上个世纪80年代，马尔康还是个封闭的小县城，我真正接触到电影还是在我高考那年。那一年，很多电影重新进入观众的视野，像《祝福》《林则徐》《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经典的电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由赵丹老师出演的电影《林则徐》和《李时珍》，一部电影时长一个多小时，演员将人物从青春年少演到白发苍苍，把人的一生生动形象地诠释了出来。看完这些电影，我觉得当演员太美妙了、太神奇了，也是从那时起，光和影扎在我心头，像初恋一样挥之不去。从此，我就立志要做一名演员。

做演员首先要过普通话这关，马尔康是藏汉杂居的地方，从小没有说普通话的环境，所以我的普通话说得很不标准。为了练习普通话，我每天捧着收音机，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小喇叭》节目当成我的普通话老师，每天模仿孙敬修老师的标准发音。但是，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的“演员梦”告诉家人，因为那时要高考，怕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我自己偷偷利用父亲让我背单词的时间，跑到山上去开嗓练声。别人从旁边经过，看见我在那自言自语，都会用特别惊讶的眼神看我，有时怕别人看见，我就偷偷爬到树上练习，就这样默默坚持。

因为花了大量时间练普通话，影响了文化课，第一年高考我落榜了，后来家人说要把我送到成都再补习一年。去之前，我给在成都工作的大姐写了封信，把自己想当演员的事情告诉了她。过了几天，大姐回信了，她说真的没想到我还有这个愿望，对于这个梦想，只要我觉得可以努力，她就一定支持我。离开马尔康的前夜，等父母都休息后，我流着眼泪跑出去，朝着成都的方向跪在地上，对着月亮发誓：不实现演员的梦想，我一定不回马尔康！现在看那时的举动挺幼稚的，但回过头来想，如果没有当时的执着也就没有今天的发展。

三年艺考路 执着与艰辛

刚到成都的时候我没地方住，姐姐在铁路系统上班，她便去求火车司机，谁开车出差两三天，就让我在他们宿舍的床铺上将就睡几晚，之后再继续换床铺。火车司机的宿舍一共三层楼，我从一层睡到三层，基本每个房间都睡过。有时，司机师傅半夜回来，我就得赶紧起来腾出床位，跑到候车室的椅子上睡一宿。到了周末，姐姐就带着我满成都找话剧演出，对着话



刘劲在电影《建国大业》
中饰演周恩来

刷海报找导演的名字，打听对方的住址，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指导。这些都是瞒着父母进行的，直到准备参加艺考时，才给父母写信告诉了他们我的想法。记得当时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他说，很奇怪我会有这个梦想，不可接受，让我去成都是好好复习文化课再考大学的，没想到我不务正业，去学演员了。父亲他们这一辈观念还是较陈旧，那时候要说儿子要去当演员，感情上、观念上都接受不了。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说可以去考，但不要影响学习。

第一年艺考考的是上海戏剧学院，那时自己就像一张白纸，啥也不懂。过了初试和复试，第三轮复试时，我落榜了。我站在发榜的地方，久久不愿离去，这时有位老师过来跟我说



刘劲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话。他说，你考试我都看了，是一个好苗子，但一看就是没学过，不要泄气，一定能够考上的。这位老师是我们四川非常著名的一位演员，是朱德委员长的扮演者刘怀正老师，但当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他成为了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教会我很多表演方面的知识。

第二年报考的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结果在第三次复试的时候又落榜了，那次落榜对我打击特别大。回到家里我号啕大哭，很灰心，觉得没有希望了，因为家里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谁也不认识，谁也帮不上我的忙，有很多埋怨也有很多失望。第二天，我看到姐姐留给我一封信，她说，这两年我们经历了这些不容易，不要放弃，姐姐永远支持你。

看完信，想起这些年姐姐为我的付出，甚至连男朋友都不谈，我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开始了第三年的复习。第三年，我吸取前两次考试的教训，功课做得很充足，最终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认真演好每个角色 总有适合的等在“拐弯处”

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人生中第一个角色是饰演“参谋甲”，只有一句台词“电报已经收到”。当时，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很多思考。比如，应该戴眼镜，胸前口袋里应该别着钢笔，胳膊应该夹着公文包等，甚至连台词也设计了很多细节。之后的好多年，我演的都是“参谋甲”之类的角色，但我并没有灰心，一直在寻找适合的角色，也从没有停止过创作人物、塑造人物的思考。起初，我不知道究竟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我知道，只有好好地演戏，珍惜每一次机会，把每一个角色演好，也许那个角色就在“拐弯处”等着我。

1995年我获得在电影《宋家三姐妹》里饰演张学良的机会，拍摄期间，我偶遇著名化妆造型师王希钟老师，他认为我不仅能演张学良还能演周恩来总理。过了几个月，我突然接到了《遵义会议》剧组的电话，原来是王希钟老师向导演推荐我饰演长征时期的周恩来总理。接到这个演出我很犹豫，之前王铁成老师、黄凯老师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把总理的形象诠释得很高了，已经让观众刻骨铭心，我再去演，要是演不好怎么办？演砸了怎么办？最后我爱人提醒我：机会也许就这一次，

不要放弃，要勇敢地往前走，要相信自己。现在看来，我在《遵义会议》的表演还是模仿的成分较多，主要是学周总理外形的东西。后来我又接拍了电影《长征》，拍摄时间8个月。在这个阶段，我系统地学习了很多关于周总理的资料，深刻地研究思考了周总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伟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爱戴他，他的魅力到底是什么，作为演员我该怎么样塑造他，慢慢地，我就找到了感觉。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传承周总理精神

电影《长征》播出后，很多当年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找到我，送给我他们写的关于总理的回忆录，带我去中南海西花厅看看总理和邓大姐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希望我能把周总理的形象演绎得更好。这对我塑造周总理的形象很有帮助。现在我家一面墙的书柜里全是关于周总理的书籍，我家中的各个角落，只要手能够到的地方，都放着这方面的书籍，有时间我就翻看学习。

塑造周恩来总理的过程中，我也时刻被他的精神所感染。我参加活动时，经常碰到各个行业的一些老同志，他们都能讲出跟周总理之间的一些故事。罗青长老先生曾跟我讲，周总理和邓大姐住的院子里，种着很多果树，有梨树、桃树、苹果树，每年秋天结果子的时候，总理就把果子全部摘下来过秤，市面上卖多少钱，他就按照那个钱数，把所有的水果买下来，把钱交到中央办公厅，然后把水果分给身边的秘书和同事。别人都



刘劲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说，自己家院子里的东西还要买？总理说，这院子是国家让我住的，里面的树和果子都是国家的财产。总理的这些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只要一谈及周总理，我就觉得很感动、很温暖。都说世界上没有完人，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周总理的精神一直是我塑造他的动力。同时，很多观众通过我的表演，把对周总理的情感也移植到我的身上。有一次，我碰见一位老同志，他握着我的手眼眶就红了，他对我说：“刘劲同志你知道吗？主席总理那一代人对我们来讲就是父亲母亲，是亲情。现在看你们拍的片子每次都掉泪，因为就像看到了自

己的亲人。你们要好好演啊，希望通过你们的塑造把这份亲情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我觉得这话分量很重，我也一直铭记在心。所以，我有责任挑起传承和弘扬周恩来总理精神的担子。

听国家林业局的同志讲，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当时为了建设砍伐了很多树木，他当时就提出要有序利用，让青山绿水常在，要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一些绿色。这给我很多启发，一直希望能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点什么，我主动成为全国绿化委会公益形象大使，经常带着同事到全国各地植树，倡导生态文明。有时我还会到大学去做一些演讲，和大学生交流这些年做公益的感受，我希望将周恩来总理的绿色梦好好传承下去、实现起来。

这二十多年来，我演了六七十次周总理。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棵大树，可以是一个梦想、一个榜样、一个信念，周恩来总理就是我心中的大树，我要用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

付出生命和热爱 才能创作好作品

作为文艺工作者，除了用行动为社会传播正能量外，还要通过好作品影响更多的人。拍《长征》时，当年红军翻雪山的地方已经没雪了，需要找其他有雪的山代替，但那就意味着海拔更高。后来拍摄地选在海拔5000米的鹧鸪山，盒饭全都冻成冰，拍完戏整个人都冻透了。当时有一段场景让我至今难忘，那时要拍一段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看到一个小战士坐在雪堆旁边，他们去拉他，小战士脸一扬就倒下了，结果发现这

名战士已经牺牲了。在拍摄这段戏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失去知觉滚下山去。过了好久，我依稀听到剧组的同事在叫我，睁开眼睛才发现所有工作人员都围着我。摄影师还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了，看回放才发现，那时候我的脸和嘴全是紫的，是大家冒着危险、费了好大劲儿把我救起来的。举这个例子，我是想说，一部经典的作品不仅与演员表演有关，更与所有演职人员的辛苦付出分不开的。虽然条件艰苦，但是要用心去塑造人物，用全部的生命和热爱去再现那一段非凡光荣的历史。如此塑造出来的人物才能堪称经典，才能真正为观众认可。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柳建伟

1963年生，河南南阳镇平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甘做时代发展的“记录员”

他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被业界称为“时代三部曲”；从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优秀作家，再到著名电影编剧，他的作品一直忠实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传递出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

弃工从文 只为记录下最美好的时代

1979年，我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系，按理说，我应该是一名IT人士，但是命运往往就是这么神奇。考入大学之后，我痴迷地爱上了文学创作，加上那个时代是一个文学开始大爆炸的年代，可能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方都有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氛围很浓，“文学梦”在我心中也愈发强烈。

因为自己是理科生，没有接受过写作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文学创作对我而言是很难的，要比文科生做更多的准备，于是我选择了向书本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刚好各种古典名著和外国名著纷纷重新印刷出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使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经典名著。另一项准备就是学习写作，当时我尝试着写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练笔，加起来可能有100万字左右，虽然

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但当时的那些练笔确实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成都军区某部，军营建在半山腰，围墙沿山而建，在军营的筒子楼里抬眼望去都是山。我的工作是负责维修一台大型计算机，这个工作很轻松也很枯燥，我每天就是在等这个计算机出故障，因为只有出了故障我才有活干。闲下来的时候，我阅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当时我就感叹，巴尔扎克作为一名作家，写了近百部作品，这些作品写透了他生活的时代，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进程和世道人心的变化，很了不得！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当一名作家的理想，我要做个社会历史书记员类的作家，为刚刚起步发展的中国做好记录——记录历史的嬗变，记录民族复兴的伟大过程。

母亲教导我：对社会有益才算“大孝”

在创作这条路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母亲。母亲是县城的一位小学教师，她严谨、认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1994年4月，母亲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我劝她去医院看看，但她说上课忙，等放假了再去吧。于是她一直坚持到了7月放暑假才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乳腺癌，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转移，情况不太乐观。检查完的第二天，母亲就进行了手术。手术之后，母亲还要接受好几个阶段的化疗。

那个时候，我正在一边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一边创作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这部小说酝酿了很多

年，我一直想写一本全方位、多层次描画当代中国生活的作品，早在1988年时就写了一个初稿，但由于不满意，就一直放着，直到1994年又重新开始解构、创作。

母亲每天都要到好几公里外的县医院进行化疗，我就弄了个三轮车，每天用三轮车把母亲拉到医院，等她输上液了，我就又骑车回家去写作，到下午再接她回来。这样持续了120天左右。母亲每天化疗都有一大笔开销，这对于我们这个工薪之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我很着急。而我当时没有名气，出版社也不可能给我预付稿费。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战争纪实类的书很畅销。于是，我就把长篇小说放下，找了三个同学一起写这一类的畅销书。那时候一千字的稿费大概是70~100元。三个同学一起写，一个月就可以写一本，一本书卖出去就能拿到两万多块钱，我们三个再分一分。我当时还挺高兴，因为终于能挣着钱了。有一天，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何启治老师来探望母亲，不经意间，将我写畅销书赚钱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不该把热爱的长篇小说搁置了，人有大孝和小孝，对家庭有益的人只是小孝，对社会有益的人才是大孝，你为了给我治病，没日没夜地写些没有营养的快销书，这相当于在把自己的事业和身体搞垮。母亲当时很激动，生气地说，要再这样，你买的药我就再不吃了。这次谈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家后，我拿出之前搁置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初稿，重新开始了创作。

做一名合格的时代“记录员”

有人说，柳建伟总写主旋律作品，只会歌功颂德。还有人说我是御用文人。我觉得他们很可笑，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军人，我的文学作品不描写国家的发展，不记录社会的进步，不捍卫国家的地位，那我该写什么？

王国维先生说过：诗人，分为主观型诗人和客观型的诗人。作家也是一样，我属于客观型作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名社会历史书记员式的作家。我生活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时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聚焦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用笔客观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其实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我称他们为“时代三部曲”。

《北方城郭》写的是我老家河南南阳，南阳是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楚文化、商洛文化、中原文化都对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想通过小说解剖这里的人物和历史，通过小城市的发展折射当代中国的发展；《突出重围》创作于1997年，那时我入伍快20年，我们这批军人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世界也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重大战役。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写一部关于部队题材的小说，凸显和平年代的军人本色，塑造有理想、有学识、有抱负的中国军人形象；《英雄时代》则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主要描写了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初，中国20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城市飞速发展，也反映

了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我想通过这样一部作品描摹当前社会的情况，从而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

“时代三部曲”主要是以我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体验为基础，结合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用艺术的手法呈现出来的作品。一个作家，只有基于时代进行的创作，基于生活进行的创作，才能得到读者和观众认可。我记得，《突出重围》在200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作为开年大戏在中央电视台一天播一集。有一次我去杭州出差，那边驻军部队的一位同志见到我，很高兴地对我说，今年有很多高材生看了《突出重围》后都报名参军，其中还有一名博士，你的作品影响力很大啊。我当时听了很高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文学创作要守得住寂寞 吃得了辛苦

2001年，我开始从事电影编剧工作。如果说小说是借助经历和思考去创作，那么电影则是选择重大事件去记录。虽然说纪实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有历史原型，但如果你只是点点鼠标、打打电话、搜搜资料，那是创作不出好的剧本的，必须甘于寂寞、甘心吃苦。

2003年，我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之后我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从天宫系列空间实验室到发射嫦娥系列卫星，一件件航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激发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我开始创作电影《飞天》。这是我第一次以航天员、火箭设计师为主角创作剧本，挑战不小。为让故事情

节更加饱满，我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剧本改了一遍又一遍。载人航天工程涉及精尖技术，体系庞大而复杂，直到2011年电影上映，8年时间，我采访了数百人，经历了十几次重写和改写，可以说是异常艰辛。这部电影讲述了中华儿女对理想、对信念的坚毅品格，传播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锲而不舍的“愚公移山”精神，作为编剧，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深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所以我拼尽全力也要拿下，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果说写《飞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写《惊天动地》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2008年5月下旬，汶川地震发生不到二十天，我接到了创作故事片《惊天动地》剧本的任务。我第一次到灾区采访，一待就是16天，到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现场时，脚下的堰塞体还在颤动，下游的绵阳已开始疏散转移群众……我从汶川搭乘直升机遇到致命浓云和气流，直升机侥幸飞到了安全高度，而同一地方的气流和同一块浓云，让我们后面的邱光华机组撞山殉职，这让我很伤心难过，也更坚定了写好剧本的念头。虽然两次遇险，但是对我自己写出来的剧本大纲仍不满意，此后一个半月，我又五去灾区，终于将剧本完成。后来听说，很多明星都不计片酬地参与了《惊天动地》的拍摄，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的大量好评，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作品应肩负起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

近几年我有三部电影上映，分别是《兰辉》《天河》和《生

命处方》。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小时代”，过于伟大、过于宏观、过于主旋律的电影票房不会太好，但我一直坚信这是一个大时代，是小人物也能活出精彩的伟大时代。文学影视作品应该肩负起对社会的批判和引领作用，要在重要时刻、关键节点站出来，起到传播弘扬正能量、带动人民迸发劲头的作用。

现在，一些年轻时和我一起搞文学创作的朋友都转做其他行业了，而我还是固执地沿这条路走着。我从小就立志以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曹雪芹、鲁迅等大师为人生导师。我认为一个作家，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后，就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劲头，要有那种“一根筋”的精神。作品就像井里的水，要先有一股劲儿把井打深，才能够找到无污染的好水。

对于未来，我对自己有几点希望。第一，我希望自己继续沿着当初选择的路走下去，走得越长越好，继续做好我这个时代记录员的工作；第二，我希望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记载是客观的、公允的，是带温度、有血肉、有气息的；第三个愿望是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想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的作品能作为一个参照。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廖昌永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曾与多明戈、洛林·马泽尔、米歇尔·普拉松等世界著名音乐大师合作主演《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假面舞会》《卡门》《茶花女》《弄臣》《茶》等30多部歌剧和百余场音乐会。

用心唱好我们自己的歌

他出生在农村，高音大喇叭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他屡获国际重大声乐比赛大奖，活跃于世界歌剧舞台；他致力于将中国本土歌剧节目推向世界，深受各国观众喜爱。

“大喇叭” 启蒙音乐

我从小出生在农村，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做职业歌唱家，因为这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了。但我从小就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电影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跟着唱几遍就会了。我们村里有个高音大喇叭，生产队用它播出工消息、天气预报，平时还会放放音乐。有几次大喇叭里放了些西洋音乐，当时我对这些歌曲不了解，不知道谁唱的，也听不懂，只是觉得这些歌曲很动听，后来才知道这些歌曲是多明戈、帕瓦罗蒂的歌。所以，有时我会说，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就是村里的大喇叭。

高考时，由于音色出众，我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从此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声乐。当时，我是四川唯一一个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但到了学校后，我发现每个同学都比我唱得好，同学们要么就是少年宫考上来的，要么就是地方歌舞团考过来的，只有我是一个“土包子”。加上我从农村出来，每个月生活费不宽裕，同学间请客吃饭我很少参加，所以那时候我也不

太愿意跟同学交往。以前没弹过钢琴，我就每天把自己关在琴房花更多的时间练习；以前没学过练耳，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去听曲子、学谱曲。但我很幸运，老师们都对我很好，每次唱完后，老师都会给我指出来，这个地方不够好，那个地方要改正，这里吐字不够好。像我们四川人，说话有时会带些方言，所以在语言矫正上要比别人多花时间。也正因为我花了时间，到了学期末，我的各门课程，包括钢琴、视唱、练耳、乐理都有了很大进步，从考进学校的最后一名变成了全班第一名。

勇闯国际声乐大赛场

1996年，我被文化部选派去法国参加图卢兹国际声乐比赛。这个比赛是一个对全世界青年歌手开放的国际性比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是国际声乐界重要的传统赛事。参加这次比赛并不顺利，由于刚到法国时差没倒过来，加上初次代表国家参赛，我心里十分紧张。比赛那天，我在台上唱到一半时，黄豆大的汗珠“啪啪”往下掉，眼睛都快看不见东西，我感觉坚持不住了，一鞠躬就往台下走，刚走到台口就晕倒了。组委会认为我唱得很好，因为身体原因就这样放弃比赛太可惜，建议我休息一会儿再唱。就这样，我被安排在晚上最后再演唱一次。我演唱结束时台下掌声雷动，观众反响很好，我便进入了决赛。决赛时，所有的摄像机都跟着我，大家开玩笑说：“这个生病的孩子又来了！”最终比赛结果公布，我的评委分和观众分都是第一。组委会成员说，这个比赛近20年来还没有一个人可以

同时获得评委和观众得分“双第一”！

不久，我又去参加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某种程度上来说，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比图卢兹国际声乐比赛难度更大，这个比赛是先通过录音从上千名选手中选40名歌手，再让歌手到现场比赛。那次参赛的歌手中很多都是跟帕瓦罗蒂合作演出过的歌剧演员，加上之前没有中国人进入过比赛的决赛，所以我感觉自己获奖的希望也不大。当时在比赛现场，一位乌克兰的女中音歌手因为太紧张，唱完出来，就控制不住地哭得一塌糊涂。看到这个场景，我突然就卸下了心理负担，以平常心面对比赛，这反倒让我发挥很好，顺利进入第二轮。一路比下来，我的表现给多明戈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获得第一名时，多明戈跟我讲的一句话让我特别自豪，他说：“你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中国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音乐教育、声乐教育。”

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获得了一些世界级奖项后，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邀请我去那里发展，并表示可以为我提供奖学金和生活费，还有一些国外的演出团体也希望我能去。老实说，我也犹豫过，因为周围有同学、同事去了国外，发展得都不错。当时，一位上海市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对我说，你到国外去，无非又多了一个没有根的游子；你留在国内，无论你去世界哪个地方演出，背后都有强大的祖国做支撑和后盾，是有根的。中国老百姓需要高水平的音乐，你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为老百姓多唱好歌。他的

话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地感到，能够为国家的声乐教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中国声乐对外交流的桥梁，是很骄傲的！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近些年，很多原来出国发展的同学、同事都开始回国了。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师资“海归”率到了90%以上。

在上海音乐学院，我主要分管本科教学和艺术实践。这些年，我努力推动学校实行一系列改革，加大艺术实践的教学分量和学分比重，目的就是要鼓励学生更多地走上舞台，多研究多思考，多研究理论，多写音乐作品。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自己想演一部戏很难。现在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从中感受到做演员、做艺术家的快乐。

2015年12月，我们学校声乐歌剧系有两部戏在排演。一部是美声专业排演的《费加罗的婚礼》，跟日本昭和大学一起联合排演，演员全都是学生。《费加罗的婚礼》是全世界十大歌剧之一，里面有大量的宣叙调和重唱，难度很大，不过学生们的表演还是很出色的。还有一部是民族声乐专业排演的大戏《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合唱到独唱、主演，全由学生完成。这两部戏，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感到很兴奋，认为找到了一个培养学生的方法和方向。

我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艺如其人”。作为艺术家，专业很重要，但道德品行、人格修养更重要。我们学艺术时，老师跟我说，你要爱心中的艺术，不要老爱自



廖昌永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我，不要老想着自己怎么着，你一定要对你所从事的职业有敬畏感。我总在想，作为一名歌唱演员、声乐教师，你心里在想什么，实际上从你的表现里面、你的表演里面、你的作品里面，都能够反映出来的。

唱好我们自己的歌

唱了这么多年歌剧，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唱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国外的。虽然也有中国作曲家写的一些作品，像谭盾的《茶》，但是中国人写的歌剧也需要用英文唱，所以在观众心中，歌剧的中国特点、中国特色还是不够的。

每年，我都会在国外举办一些独唱音乐会，演唱曲目中，

我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是中国本土作品。一次，我在挪威做巡回独唱音乐会的时候，有很多观众跟着我在城市间巡回，我很奇怪，就问他们，昨天不是在那个城市见到你了吗？你今天怎么又来了？他说对啊，我就跟着你走的。我问他为什么？他们说，中国歌曲太好听了，我们跟着你可以多听一听中国歌曲。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文化的交流和推广非常必要。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将中国歌曲更好地传播出去，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

去年年底，除了参加新春音乐会和春晚之外，我主要是参加《记住乡愁》专题音乐会的演出。这台专题音乐会是为配合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二季开播而录制的，通过歌曲、舞蹈、朗诵、音乐剧、交响乐及外拍短片、现场访谈等多种形式，生动感人地表达乡愁，表达中华儿女致力于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内在动力和必胜信心。这场音乐会，可以让很多外国朋友通过12首主题歌曲，更好地了解纪录片中一个个动人的乡愁故事，了解中华儿女不忘故土、落叶归根、思念家乡、守护家园的赤子之情。

最近几年，我在中国作品的整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现在做了10多张唱片，除了意大利歌曲、西洋歌剧咏叹调和一个俄罗斯作品之外，其他都是中国作品，其中包括艺术歌曲、创作歌曲、电影歌曲、民族歌曲、通俗歌曲，各种形式的都有。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音乐家，首先要以唱好中国作品、振兴祖国文化为己任，我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家能一起来做这件事。

努力定能迎来中国歌剧的春天

有一段时间，国内的歌剧创作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现象。多投资金，用一两个月就做一部歌剧出来，这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搞艺术创作，首先要静心，要深入生活，要言之有物。这些年，在歌剧创作中，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一直努力兼具可听性、可看性、思想性，打磨好几年的《木兰诗篇》以及前段时间复排的《白毛女》等，都是音乐工作者们总结创作经验、探索市场需要推出的作品。

从2014年开始，我们以上海为背景题材，着手创作歌剧版“上海三部曲”。2014年完成了第一部《一江春水向东流》，接下来还会不断跟进《日出》以及其他歌剧。“上海三部曲”的创作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我想，困难再大，也要继续做下去。

近些年，我们国家的艺术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不仅是很多城市都建设有特别棒的歌剧院，而且各地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歌剧作品。但是，总体上我们还缺少人才，还需要优秀的本土歌剧作品。剧院里有优秀的剧目可演，才能真正推进城市的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坚持和努力，中国歌剧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李春雷

1968年2月出生，河北省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代表作品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宝山》《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等。

作家一定要找好自己的“准心”

他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徐迟报告文学奖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的获奖者；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被文艺界公认为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品；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

父亲帮我播下文学梦的种子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小时候，著名作家从维熙的堂弟插队到我们村，经常到我家吃派饭。他和我那喜爱文学的父亲成了朋友，经常聊起北京城里的文坛故事。我的父亲就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儿时的我听，所以我文学梦的种子在那时就种下了。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用铅笔在作业本的背面尝试写小说了。这主要是受到连环画的影响，连环画就是讲故事，我模仿写雁翎队抗日故事，写了四五十页，那便是我最早的小说。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当时太小，思维等各个方面都不太成熟，但是，我的老师和我父亲看完后就表扬我把主人公的名字起得很大气，孩子们一般写作文，起人名都是小明、小花这类，但我当时用的却是“任满天”这些很成人化的姓名。

上初中的时候，一位高中语文老师看过我的作文后，觉

得我是写作的料，很喜欢我。后来我因为偏科、成绩差没能考上高中，他就把我以他自己子女的名义向校长再三推荐，希望破格录取，当时学校对教师子女是有照顾政策的，最终我如愿以偿升入高中。如今，每到过年过节，只要有时间我都要看望我这位恩师。人生中有这样的恩师也真是幸运，如果当时我上不了高中，应该就没有今天的发展。

由于这个缘故，上了高中后，我开始狠抓学习。我初中时数学考十多分，英语考七八分，但是上了高中以后，这两门课也赶上来了，高考的时候这两门课反而给我增分了，后来我上大学居然读的是英语系。

记得1984年9月，我上高二，邯郸市举办了一场国庆征文大赛。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参加了。我先写了两篇散文，但是都不满意，一天晚上我又写出了散文《笑笑饭店》。第二天我拿给老师看，老师看完后怀疑我是不是抄的，我说是我写的。我的老师感到很惊奇，他说不管这次征文有多少人参加，多大的范围，他敢断言这篇文章肯定是一等奖第一名。一个月以后，我果然拿了一等奖第一名。这次获奖让我第一次找到了文学的感觉，苦水磨剑这么多年，奠定了今后的自信心。

大学毕业我到了邯郸日报社工作，当时我年轻气盛，有梦想有精力，写了很多作品，发表量很大，也拿了很多奖。我平常阅读量比较大，进报社的时候以为新闻稿好写，一上手就感觉不是那么容易，我感到失落。但我虚心向一些老记者学习，很快就上路了。再加上我有文学底子，后来发表了不少通讯作

品，表现应该说还不错，其实这些通讯作品就是我早期的报告文学。

受伤才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在报社从事新闻工作以后，仍然一直怀揣着文学梦，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在搞了几年新闻后，我感觉应该有进一步的突破。于是在1998年“全国工业学邯钢”大潮中，我勇敢地走进了邯钢。当时，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和很多作家，都在以邯钢为题材进行多种形式的文艺创作，而我是当地的一个小记者、一个本地的文学青年，我感觉我要利用好这个优势。当时邯钢生产特别紧张，也没人关注到我，我就以当地人的身份深入采访了邯钢的一些基层工人、退休老干部，我还和工人们在一起吃住，连过春节我也没有回老家。

我们平时看到的电视画面上钢花飞舞很有诗意，但对钢铁工人来说每一朵钢花都是隐患：钢花的内核是钢液，每一滴钢液温度是1600度！钢铁工人在炉前虽然有保护服，但钢花会落到人的头发里，钻到人的耳朵里，令人防不胜防。所以说钢铁工人工作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我记得邯钢的老总曾让我看看他的眼睛，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你细看一下。原来他经历过钢液溅到眼睛的事故，上下眼皮受伤，万幸的是视力没受到影响。

1998年大年三十，我在邯钢和工人们一起守岁。那天晚上发生了一次事故：钢水大喷。我急忙往远处跑，可一滴美丽的钢花还是追上了我，落在了我的左手中指上。我本能地用另



李春雷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一只手去抓，顿时，血肉模糊，火辣辣的疼痛。在我拼命往外跑时，工人们却是迎着稠密的钢花，去排除事故。这一次事故中，两人重伤，数人轻伤。我是农民出身，对钢铁到底是怎么样炼成的，我根本不知道，但通过钢花给我留下的伤疤和疼痛，彻底打通了我和工人之间的情感，一些灵感翩翩而至。

当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处女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后，很多人没想到一个年轻人能把炼钢的苦与甜、钢铁的曼妙与芳香写出来。这篇作品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媒体发表。

在地震灾区进行“生死奋战”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当天夜里，我就主动向中国作协请缨参战，并有幸成为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作家。当时的震中地区时时发生强烈余震，极其危险。我背着睡袋、干粮和饮水，步行在滚石乱飞的山路上采访，长达一周时间，几度死里逃生。在

最短的时间内，我创作了一部长篇和3个短篇，其中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棚花村》后来被选入《大学语文》课本。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我再次请缨。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我独身一人连夜飞往西宁，又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18个小时，翻越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以最快速度到达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雪域深处的震中——结古镇。由于行动突然，缺乏休息，极度疲惫，且是初上高原，我的高原反应特别强烈，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满眼金星、头痛欲裂，几次昏倒，只能依靠吸氧和喝葡萄糖维持。最难受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前线指挥部急忙联系飞机，让我与伤员一起转移。但我明白，北京方面只有我一个作家在场，使命在身，不能后撤，死也要死在最前线！死也要死在岗位上！

就这样，我穿着军大衣，戴着风雪帽，每天步行20多公里，坚持在地震灾区采访，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的干草地上躺一下。采访结束后，我没有休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了4篇作品，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和《文艺报》上。

深入采访帮我找到“朋友”

说到纪实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这部作品，我应该感谢《光明日报》。习总书记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期间，认识一位作家朋友叫贾大山。贾大山逝世一周年时，习总书记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后来又经《光明日报》发表，在

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背后应该还有很多感人故事，可以再深挖一下。

2014年春节前，我到河北省正定县进行采访。除了单独的深入采访外，我还把当年与习总书记一起工作的一些老战友、老同事请到一起共同采访，并反复印证。通过采访，我进一步受到触动。习总书记当年在正定工作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是贾大山，而在贾大山临终前，习总书记到他的床头探望并和他合影。这个故事真实、感人且完整，是任何天才作家也虚构不出来的，而且拥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永久的历史价值。于是，我决定打破传统，用纯正的文学笔法去书写，为历史留下最真实、最精美的记忆。

2014年整个春节期间，我精心创作了《朋友》，历经20天。我深知这部作品的故事要绝对真实。采访的时候，对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故事我都反复核实，不能有丝毫的虚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在绝对真实性的基础上，我又用文学语言、文学的结构将素材进行了剪裁、加工。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我试图通过习总书记与贾大山的“正定之交”，给社会提供一些思考，无论从尊重文化、尊重人才的角度，从勤于读书、善于学习的角度，还是从勤政廉政、干事创业的角度，从端正友谊、完美人格的角度，都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文学创作一定要走大路、走正路

文学作品最终是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作家天生应该具

备为人民、为国家写作的责任，写正能量、写真善美。作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准心”，往这个方向走，走好了以后，你的思想性、艺术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大部分人喜欢你、阅读你了，市场自然就起来了。因此，文学还要走大路，走正路。

深入生活，应该是作家永远的功课。其实，每天我们都在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作为一名作家，你表现的不能仅仅是文人圈里的事，你要表现文人之外的多彩世界。所以，我不仅要熟悉我已经熟悉的生活，还应该走进自己陌生的生活。

2014年底，我主动申请到基层去锻炼，组织批准我到我们省的一个县去挂职。我几乎把全县的乡村走遍了，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深深感受到新时期中国农村细细碎碎而又轰轰烈烈的变化，也对于“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是从扎扎实实的创作中走出来的，写群众、写生活、写感受，让我和老百姓肩并肩、手拉手、心连心，但这一年的挂职锻炼给了我更多的收获。我和县委宣传部门一起，谋划了多项富有成效的工作，比如“文明燎原行”“网络媒体走进邯郸县”“中国作家看邯郸县”“南街村文化艺术节”等宣传文化活动，有些是我过去几十年耳闻过但没有经历过、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的。目前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挂职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今后我将带着这些体验和力量，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范小青

1955年7月出生于上海松江，从小在江苏苏州长大。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十九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市表情》获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短篇小说代表作《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文学创作也需要“工匠精神”

她是文坛“劳模”，从25岁发表人生的第一部作品到现在，作品已经超过1000万字；她的笔触总是停留在社会基层的民众，描绘众生百态，展现喜怒哀乐；她的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描写，只在细腻生动、柔软平和间映照出时代生活的巨变……

知青经历是宝贵的人生积累

十几岁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我十多岁的时候，随下放锻炼的父母一起到农村，城市小巷里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大片的土地，看到那么多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情，才知道原来世界可以存在很多的不同。

我记得在农村的中学读书时，因为没有鞋，下雨天是光脚上学的。我成年后的手和脚长得偏大，跟我身高比例不相称，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光脚干农活太多造成的。当时，我年龄小，还不太懂事，对生活的艰苦、家庭的变化，都没有觉得那么可怕。粗重的农活把我的个性释放出来，我反而觉得在农村和农村孩子一起学习、劳动，把心扉打开了。

《赤脚医生万泉和》是我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中就有我们当年下放农村时的深刻印记。虽然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虚构的，但是时代背景和当时农村医疗现状完全是真实的。小说出

版时，我请一位画家朋友给我画了几幅插图，是按照当时我们下放农村院子的形状来画的。院子里中间那间房子住的是我们一家人，隔壁是大队合作医疗站，还有另外两户。我记得，村里合作医疗站的一位医生是从乡镇卫生院过来的，还有一位是从部队转业的卫生兵，我在小说里也都写到这样的人物。

高中毕业以后，我一个人去插队当了知青。在农村前前后后生活了十年，这段经历确实很难忘，也是我写作中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写的就是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文学可能就是需要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体验、去感受，才能产生创作的灵感和欲望。

希望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农村到城市后，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观察进城农民工。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帮我们装修房子、送水；他们日夜站在小区门口，守护着市民的平安；他们怀着美好的向往来到城市，顽强地生活着……这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现象，所以我写了短篇小说《城乡简史》。小说描述了一个有记账习惯的城里人蒋自清，他的一个账本被误捐了出去，辗转到了甘肃西部的王才手里。王才被账本中记的一瓶“香薰精油”弄糊涂了，为了搞清“拇指大的一瓶却要475元的香薰精油”为何物，他举家进城，租住在车库收破烂。车库隔壁的业主，就是账本主人蒋自清，二者免不了打交道，不过他们不可能相认。城市对农民工的理解、关注和帮助到底有多少呢？这正是小说



范小青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想提出的问题。

后来我又关注到更年轻的一代农民工，最早进城的那辈农民工是他们的父辈。老一辈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很简单，赚钱寄回家造房子、给儿子讨媳妇等。但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光是打工赚钱，更希望有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一位公司老总给我讲过一个现象：他们公司的保安全是二十岁上下的农民工，住公司集体宿舍。每个月的上半月，晚上宿舍里是没有人的，因为月初发了工资，他们就出去下馆子、K歌、看电影。到了下半个月，这些年轻人晚上都在宿舍里闲着，因为没钱了。这说明，年轻的农民工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却

还不知道怎样去做。我们如何给予他们关注和帮助？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他们。

后来，我的目光又渐渐扩展到更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农村、乡镇或比较偏远的小城市，有一定的学历，他们过得也许比农民工优越一些，但是在城市，他们同样是最艰辛的一个群体。尤其是上过大学的年轻人，不仅自己有梦想，还背负着家人朋友的梦想。他们的压力比农民工也许更大。在城市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如何面对生存压力，如何实现梦想，都激发了我写作的激情。我渴望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写出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于是，家电安装工、网络维修工、房屋中介等，都来到我的作品中。我打心底深处关心和关注着这群人，我希望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街巷里弄的人和事情有独钟

每个作家的兴奋点不一样，关注点也不同。我的小说关注的对象始终是社会最基层的人物，农村题材里写农民、农民工，城市题材关注的也都是普通市民。也有评论家开玩笑，说我的小说里没有处级以上干部。我就是对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感兴趣，非常关注、留心他们。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刚当专业作家的时候，就主动跑到居委会去挂职，后来还曾到区政府挂职，都是为了了解城市居民的生活。记得在居委会挂职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房屋普查，居委会聘请放暑假的大学生挨家挨户去丈量。我们丈

量房屋的过程中，有一家人我记得非常清楚，七八口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一对老夫妻、两对小夫妻，还有两个孙子辈的孩子。怎么住呢？屋里搭了一个铺，男的睡在下面，女的睡上面。当时大家就想，这样情况下，小孩是怎么生下来的呢？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可笑，其实非常辛酸。老百姓生存的艰难触动了我，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作《裤裆巷风流记》，就是写城市改造中住宅的一些问题。

我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一个关于社区居委会的故事。这个题材出发点是因为我们那儿有一位优秀的居委会干部去世了，她是一位道德模范，事迹非常感人。我从她的事迹出发，来写这群在城市基层、为居民排忧解难、为政府搭建桥梁的好同志。同时，我也注意到，在一些社区里，因居住环境、人员管理等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加剧了社区工作难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居委会工作人员收入低、办公经费少、社会关注度低。为此，我除了想写好这方面题材的小说，还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社区居委会的支持力度，解决人员结构老龄化问题，提高工作待遇等，而且，要从舆论上引导全社会正确认知居委会的工作。

“写书人”先要当好“读书人”

除了写作，我还是一个专业的读书人，虽然每天的事务性工作占据了我不少时间，但是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集中阅读一些好书。比如今年春节放假，我就准备了厚厚的10本书，用

几天时间读完。虽然各种“朋友圈”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吸取一些信息，但是真正需要的基础营养，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靠阅读书籍来补充。

江苏省连云港市有一位残疾农民，和老母亲一直在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依然非常喜欢读书写作，读了大量各方面的书。他曾给我写过几封信，我很为他的精神感动。后来，我和同事就专程去看他，我们协商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送给他，热情鼓励他读书、写作。不久他就学会了使用电脑，随后还开始写长篇小说，是关于农村养老院方面的题材，小说的构思、文笔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提高。

现在的读者有两个不太合适的阅读倾向，一是希望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信息；二是比较功利，要开公司就买营销秘籍，要炒股票就买本股票指南。其实真正的阅读，更多的是需要全方位的营养。这种营养会培养人的人文情怀，提高人的生活品味，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孩子，更需要多读一些具备基本营养价值的书。我觉得在提倡全民阅读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各方面一起来做工作，引导人们多读书、读好书。

好作家要做有心人

如何成为一名好的作家，我觉得天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有心人。生活中很多现象都是大家见怪不怪的，但是如果你一个作家也见怪不怪，那你就写不了东西。因此，写作也有

一件万变不离其宗的事情，这个“宗”就是大地，就是我们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虽然担任江苏省作协主席以来，工作很忙，但我也从没因此停止思考和写作。因为随时会有想法出现，我就经常备一些纸条和笔，想到什么东西赶紧记下。所以，我的笔记非常多，都是小纸条。

作家的心要与群众的心息息相通，要在感情上跟各阶层的人们沟通，触碰他们的喜怒哀乐。作家无论人在何处、家在何处、工作岗位在何处，心一定要在下面。下面是群众，是大地，是我们牢不可破的基础。只要大地还在，我们的根就不会动摇；只要大地一直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作品就能不断地创新创优。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一个词“工匠精神”，他是针对制造业来说的。玉不琢不成器。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有这种精神，包括我们文字工作者。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有些作家写文章，恨不得今天有想法，明天就写出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赶得上时代。这种快节奏对精品的生产是有影响的，真正的精品，需要慢慢打磨和酝酿，需要岁月的冲刷和涤荡。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茅善玉

1962年1月生于上海，1974年考入上海沪剧团学馆，1979年毕业后留团担任演员。现任上海沪剧院院长、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二届和第二十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首届和第七届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第四届中国戏剧节优秀主角奖、第二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等奖项。

演戏就好像凉水泡茶 ——慢慢浓

她小小年纪成为名角，从《红灯记》里可爱勇敢的小铁梅，到《石榴裙下》中善良悲情的卢雯慧，再到《一个明星的遭遇》里风姿绰约的周璇，嗓音甜润、情深味浓，被誉为“沪剧女皇”；从演员到院长，她为振兴传统地方戏奔走忙碌、呕心沥血……

不服输的劲儿让我走上沪剧表演之路

我是从12岁开始学习沪剧的。那一年，上海沪剧团第一次单独办学馆培养沪剧演员。当时，我对沪剧没啥概念，怎么唱？什么形式？完全不懂，只是理解为唱唱歌、跳跳舞。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居然考上了。

虽然进了学馆学习，但是由于我没有任何基础，专业水平比同时进去的其他孩子差了一大截，人家都学得有模有样可以登台了，我还没出师。那时我甚至还没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发声，演唱完全靠大嗓门、乱喊乱唱。

记得有一次，我们演折子戏《星星之火》，我饰演一个12岁的包身工。其他演员一开口就有观众喝彩，而轮到我唱时，一开口观众就喝了倒彩，因为高音基本上不去。事后，老师和剧团领导都来找我谈话，很委婉地说我可能不太适合沪剧演员

这个行当，建议我转行到舞美队去管服装。我当时很失落，我是来当演员的，怎么能让我去管服装呢？灰心丧气之余，我内心涌上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对自己说：不行，我一定要当演员！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老师。我很感激老师们，他们很尊重我的想法，说再给我半年时间，如果我能在专业上有所进步，就继续唱。同时，他们还鼓励我说，虽然我的嗓音不像其他沪剧演员那样脆亮，但这种略带沙哑的声音还挺有沪剧特色、上海味道的。

于是，我开始拼命苦练基本功。或许是我运气好，那会儿剧团来了三位声乐老师教学生们发声，我就一位老师一位老师地主动去请教，来比较哪位老师能帮助我解决问题。但是老师不是很愿意教我，因为我不是他班上的学生，教我就挤占了教其他学员的时间。我便死皮赖脸地赖在老师那儿，请老师在别人练完之后，帮我额外辅导十几二十分钟。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一点一点地找到了感觉和方法，逐渐把不会发声的问题解决了，最终剧团也把我留下继续做演员。

1979年我们本该毕业，但是那个年代学艺不学传统，对传统沪剧了解不够，学得不够好、基本功不够扎实，领导决定让我们50名同学在学馆多学一年。通过这一年的回炉，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传统剧目，学习了更专业的唱法技巧。

好演员要在心里善待观众

从开始当演员的那一刻，我就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当个

好演员，要当个对观众负责、让观众认可的演员。因为大家来看一出戏，买票时并不知道戏好不好看，都是冲着里面有自己喜欢的“角”去的。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观众是衣食父母，更是终极裁判。

毕业后，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角色，在《一个明星的遭遇》中扮演电影演员周璇，我非常珍视这个机遇。由于周璇当年在上海非常有名，加上演出中还要演唱她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我压力非常大。那时只要醒着，我就打开留声机听周璇的声音，房间里摆满了周璇的照片，仔细琢磨她的神态举止、一颦一笑。我把自己像泡茶叶一样，天天浸泡在周璇的世界里。后来这部戏获得了好评，我也因为这部戏被观众所熟知。

上世纪80年代，我连续获得了第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略有名气，我开始有些骄傲。当时，我的老师及时告诫我：现在观众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表演；如果你还是原地踏步，观众就会慢慢疏远你。你必须要保持不断学习，善待观众，才能走得更远……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中。

2007年7月，我在沪剧新戏《瑞珏》中扮演女主角。作为主演，不仅唱段多、戏份重，十分辛苦劳累。演出前几天，我累得突然咽喉水肿，连着两晚靠打针控制病情，到了第三个演出日，我的嗓子完全失声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的心情特别沉重：这么热的天，观众来一次剧场多不容易，如果让他们乘

兴而来、扫兴而归，我怎么对得起观众？于是我再三恳求医院想办法让我能登台。医院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加大口服激素剂量，采用静脉和咽喉部位注射的方法，最后总算没有影响到那天的演出。虽然治疗的过程很痛苦，但是我很开心，作为一名演员，一定要对得起观众对你的期望，只有不让观众失望，观众才不会让你失望。

想方设法解决剧院发展难题

2002年，我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舞台表演转换到了上海沪剧院的管理上。其实一开始，我并不想当这个院长，我认为我是一名演员，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献给舞台。后来领导找我再三谈话，说现在沪剧的观众流失很厉害，沪剧需要传承弘扬，需要懂沪剧的人接过这根接力棒。于是，我通过竞聘程序接下了上海沪剧院院长的工作。

刚上任时，正面临各地沪剧剧团大部分解散、小部分苦守的处境，人、财、物都非常紧缺。记得当时剧院正在筹划一台大戏《石榴裙下》，但是我们连40万元的投资资金都凑不齐，最后我想到了向全院职工集资的方法。大家凭着对沪剧的热爱，拿出了平时省吃俭用的积蓄投资入股。每每想起这事，我都挺感动，也挺后怕，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后来，这部戏反响非常好，场场观众爆满，到了第11场，成本就全部收回了。

沪剧传承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紧缺。剧院演员队伍所有人加起来就二十几个人，而且演员年龄出现了断层。由于



茅善玉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人数有限，我们只能排五六个角色的小戏，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大戏，我们根本就排不了。那时候我就在想，这样下去沪剧就完了，经典剧目长年没人传承，原创剧目也无人演，最后就会彻底消失。所以，我当时最着急的就是必须抓紧招收、培养新人。

在招生过程中又面临一个窘境，正宗的沪剧表演要用上海方言，之前沪剧院只招上海本地户口的学生，现在本地孩子对学沪剧兴趣不大，根本无生可招。我们与教委多次沟通，最后教委同意可招外地学生。即便如此，2005年到2006年招生，也只有100多人报考，到了复试的时候只剩80多人了，远远没有

我们当年几万小朋友同时报考的火热场景。最后，我们挑选了28个人进行培养。

培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些孩子完全是零基础。比如，外地孩子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讲，老师们只得先一字一句教上海话，直到这些孩子能流畅地说上海话，通过最起码的语言关。另外，声、台、形、表等都要学习。沪剧教学跟其他剧种一样，也是口传心授，一招一式要通过演员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来表演。如今，这些孩子们都逐渐成熟，成了剧院主力。他们的到来，让剧院队伍整体年龄层往下降了很多，也让剧院充满了朝气。

虽然剧院接班人的问题暂时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我们没敢懈怠，还需要搭建好沪剧演员的年龄梯队。2013年我们又招了一批小朋友，老、中、青、少每个年龄层的演员都有了，这样沪剧演员才不会断档，沪剧艺术的生命才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积极推动传统沪剧艺术推陈出新

有人说，沪剧走出上海就没有了影响。从某些角度上来说，沪剧的确具有唯一性。但是沪剧的魅力也在于它的独特性，这么多年来它并没有被其他剧种所同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因此，我对沪剧的未来是乐观的。如何把沪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外地观众喜欢它，一直是几代沪剧人的心愿和责任，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在保持其传统的同时，还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把沪剧艺术中的精华传承下来。

沪剧如何走近观众，让老百姓喜欢看？我想，要从艺术角度出发，不断打磨、传承那些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保留剧目。与其他一些历史悠久的戏曲剧种相比，沪剧并没有太多“压箱底”的老本子。正因如此，更要把保留剧目代代相传。像《雷雨》，70多年来被几代沪剧艺术家不断排演，已经成为目前沪剧舞台上最常演的经典剧目。

此外，我觉得沪剧一定要不断创新。2006年5月，沪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研究如何让沪剧和上海文化相结合，衍生出一些新的剧目和种类。我们考虑，能不能有沪剧驻场秀，就像美国百老汇一样，用“跨界”方式推广展示沪剧艺术。令人欣喜的是，如今政府对沪剧的投入大大增加，演员们的待遇提高了，外部演出环境也有了很大改观，看沪剧的观众越来越多，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作为从事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一名传承人，我感觉找到了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强和自信，干劲也更足了。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陈爱莲

193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戏曲与舞蹈研究所所长、中国歌剧舞剧院舞蹈家兼编导、陈爱莲艺术团团长、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校长。曾主演《鱼美人》《红旗》《白毛女》《文成公主》《红楼梦》《牡丹亭》《繁漪》《霸王别姬》等舞剧。

长袖舞出中国风

她，是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她，是将芭蕾舞与中国舞艺术结合演绎的第一人；她，从艺六十余年，不断挑战自我，演绎无数经典……

从孤儿到舞蹈演员

1939年，我出生在上海，父母对我十分疼爱，家庭温馨而幸福。然而命运弄人，十岁那年，父母因病相继去世，我成了流落街头的孤儿，以捡破烂为生，后来遇上了好心人，才被送进了孤儿院。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到上海招生，我很幸运地被选中，开始了专业舞蹈的学习。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为了练功，我每天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晚上其他同学都在玩耍，我就趴在练功房的窗口“偷学”其他演员排的折子戏。功夫不负有心人，1954年，我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

我们是北京舞蹈学院正式招收的第一批舞蹈专业学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所以学院很重视对我们的培养。我们学习的内容涉及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毯子功技巧、西方芭蕾舞、现代舞等各个舞蹈类别，七年专业舞蹈学习为我的舞台表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班准备编排舞剧《鱼美人》，并邀请了苏联著名舞蹈专家古雪夫作为舞剧的总编导。古雪夫对中国古典舞非常热爱，希望能打造出一部将西方芭蕾舞与中国古典舞相结合的舞剧作品，所以对主演这部舞剧的演员，他希望是既能跳好芭蕾舞又能演绎中国舞。于是，学校就按照学生们平时的各科成绩选定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主演这么大型的舞剧。为了演好这部剧，我四处拜师，得到了更多专业老师的指导；我们的老校长、杰出的舞蹈大师戴爱莲先生还专门为我教授芭蕾舞的足尖技巧。因为剧中女主角是半人半鱼的海底公主，所以我到图书馆里查阅资料，还到公园观察水池里的鱼游来游去的姿态，有时还会随着鱼的游弋在水池边手舞足蹈……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把中国舞蹈扎实的基本功和西方芭蕾舞的元素完美结合，才能更好地诠释《鱼美人》。

1959年，我登上了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舞台。在我20岁生日时候，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的上千位观众，一起观看了由我主演的首部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融合之作《鱼美人》，并给予了高度赞赏，我也因此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随后，我的演出机会逐渐多了。1962年，我参加了在芬兰举办的第八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得了四枚金质奖章。诸多的荣誉并没有让我迷失自己，我时刻铭记自己是一个孤儿，是国家、是人民培养了我。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的时候，校长就给我们讲过一个形象的道理：60个农民一年的劳

动成果才能养活一个舞蹈学院的学生，你们可要好好珍惜。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从进入舞蹈学院那一天起，我就树立了一个信念，要全身心地回报祖国，要回报人民。

用舞步行走在乡间

1963年，我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有了更多到农村去演出的机会。那时，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有时我们就住在学校教室里，稻草就是我们的床和被褥。但我们那时也没有觉得有多苦，还互相开玩笑说：“大家也算有了头顶飞机（苍蝇、蚊子），身躺地雷（跳蚤、老鼠）的经历。”

记得有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到农村去演出，舞台就是田间的土坡，土坡边上有个麦秸秆搭的小棚子，里面支了个巴掌大的火炉，演员们就在那里换装、候场。土坡四周挤满了穿着厚厚棉袄、充满期待眼神的乡亲。我们穿着短袖、挽脚裤跳舞，跳完了浑身都冻僵了，感觉笑容都冻在了脸上，但是看见村民们开心的笑容，我们心头也是暖暖的。

后来，我的两个女儿相继出生，而当时我们的节目在百姓中很受欢迎。因为孩子经常没人照顾，我就带着她们一起下乡。那时出行，演员们都是挤在一个简陋的大轿车里，一走就是一天。路上时间太长，孩子们又小，需要照顾吃喝，我就在临行前准备些烧饼和咸菜，让孩子们凑合着吃。演出时，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她们，就任由她们在田间地头爬来爬去，演出完了，再把她们带回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那段时间的锻炼，两个女

儿长大后独立能力都比较强。

我觉得我演绎的很多角色之所以观众能喜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非常丰富的基层演出经历。若舞台表演不能真正地与人民亲密接触，我们的艺术何来中国魂？记得有一次我去南海舰队驻扎的小岛演出，岛上只有十几名战士，他们长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很少与家人团聚。当我们表演时，看到他们眼神中充满期待和喜悦，我觉得作为舞蹈演员很光荣，我们的艺术很有价值。

四十二岁开始演林黛玉

我演过的众多舞蹈角色中，林黛玉应该算是演的场次最多的一个。第一次演林黛玉是在1981年，那时我已经42岁了。当时，我们剧院于颖导演创编了舞剧《红楼梦》，并决定由我来演林黛玉这个角色。《红楼梦》的人物线索、故事情节非常复杂，要把它用舞蹈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出来，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林黛玉更是剧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我跳得如何会直接影响到观众对整部舞剧的评价。我暗暗铆足劲，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读原著，揣摩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这次首演非常圆满，当时有媒体评价说我是“活林黛玉”。

1997年，我牵头复排《红楼梦》，那时候我已经58岁了，当时因为有媒体报道“年过半百的陈爱莲再次演绎林黛玉”，在那个舞蹈演员是吃“青春饭”的誤導下，一时间社会上曾为我是否适合饰演这个角色，掀起了讨论。一些质疑的声音提醒



陈爱莲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了我，我和角色之间年龄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要想更好地演好林黛玉，除了要保持优雅的身形和良好的舞蹈功底外，更要演绎出角色的性格和情感。为塑造一个既符合原著又被观众喜爱的林黛玉形象，我反复重读《红楼梦》，力求进一步理解原著精神，深探林黛玉的灵魂。在1981年第一版舞剧《红楼梦》中我不断地做出调整和创新，最终，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我很激动，我告诉自己，虽然岁月不饶人，但舞台表演的艺术生命可以延长，尤其是对经典舞剧的复排，每一次都要有新的突破。

办学重艺更重德

在199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我被国家领导人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讲话触动，联想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办学的念头油然而生。很快，以我名字命名的舞蹈艺术学校就正式成立了。学校开始招生后，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每天除了处理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外，还要授课。我把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编成教材，传授给学生。我觉得，办学不是做生意，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要教给学生真正的舞蹈技能和做人道理，使他们能够为社会做贡献，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是孤儿，太清楚言传身教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我看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二十四孝”故事，对我的人生起到了很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学校非常重视文化课的学习，同时学校还建起了图书馆，规定孩子们必须拿出时间去读书，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因为练舞蹈而荒废了学业。

2014年，我去贵州采风，了解到当地艺术教育资源匮乏，就萌发了帮助当地培养舞蹈人才的想法。在当地文联的帮助下挑选了10名来自贫困家庭且喜爱舞蹈的男孩，带回北京培养。之所以选择男孩子，是因为现在专业舞蹈演员中男演员太少，希望通过培养，能为国家输送一些优秀的男舞蹈演员。通过两年的专业学习，他们长高了，专业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完全不会跳舞的“淘小子”成为了镁光灯下的“美少年”，我真

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曾有人问我，这么多年坚持在舞蹈艺术一线的动力是什么？也有人劝我，你年龄不小了，该闲下来了。但我觉得，我没有理由随便放弃，虽然生命是父母给的，但是真正为我提供学习成长机会的是国家、是人民，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说，有两个陈爱莲，一个是普通人的陈爱莲，一个是在舞蹈领域肩负着责任使命的陈爱莲，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直指引着我跳好自己的舞蹈，为国家的舞蹈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付林

1946年出生，黑龙江富锦县人，著名词曲作家。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曾任海政歌舞团演奏员、副团长、艺术指导等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如《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楼兰姑娘》《天蓝蓝海蓝蓝》《故乡情》等。

好音乐要经得住岁月淘洗

他，出身贫寒，18岁时凭借过人才艺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启了从军从艺的人生之旅；他，勤奋高产，创作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等至今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他，热心音乐教育事业，古稀之年还创办网上音乐学院……

一支竹笛敲开军艺大门

1946年1月，我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县。小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改嫁，我随了继父的姓。继父是位老实巴交的渔民，每年夏天都会到乌苏里江打鱼，挣回辛苦钱贴补家用。因为家庭变故，我寡言少语，和继父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不过，继父知道我喜欢听音乐，有一次外出卖鱼回来送了我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台旧收音机。我从这旧收音机里听到了很多动听的音乐，包括不少苏联歌曲，音乐大门也渐渐向我打开。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和钢琴、小提琴固然是没有缘分的，我就花几毛钱买了一支竹笛开始自学。因为家里房子小、人口多，家人受不了我吹笛，所以即使在冬天我也只能去外面练。户外实在太冷了，我练十分钟就得马上跑回屋里烤烤

手、暖和一下。现在想来，当时我对音乐真是很痴迷的，那么艰难的条件都没有阻止我的竹笛吹奏练习。

上高中时，学校有鼓乐队、铜管乐队、吹管乐队、民乐队。我从打鼓起步先加入民乐队，后来又组织了一个小西洋乐队，当我组织几个同学用小提琴演奏了《花儿与少年》和《新疆之春》后，收获了很多掌声和鼓励，从此，我越来越喜欢音乐了。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一门心思地想考音乐学院。那时候，我老家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大学生叫严铁明，他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读书，每到寒暑假就回到家乡富锦县，他很用功，每天都会练习。我们两家只隔着一条街，于是我就经常跑到他家门口偷听他吹笛。后来经人引荐，他成了教我笛子演奏的启蒙老师。

1964年，高中毕业的我来到哈尔滨准备报考沈阳音乐学院，恰巧当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在东北三省招生。“上学不收学费，穿军装有补贴，还能去北京”，这对家境贫寒的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在考场上，严铁明用笙伴奏，我用竹笛演奏了《欢乐歌》《五梆子》两首曲子。军艺的老师特别满意，过了两天就给我回话了：“别的地方不要考了，你被录取了！”就这样，18岁的我踏进了军艺的大门。

军旅生涯是我的艺术源泉

1964年，对我个人来说是划时代的一年，是我从军从艺的起点。那个年代的文艺兵，首先是当兵，其次才是搞文艺，所

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跑操，接受军事训练。我们进部队三个月，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听到哨声就赶紧起来集合，说打背包就打背包，所有的东西带齐去野营拉练，困得实在不行，边走路边打瞌睡……

军艺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政文工团。当时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为基层战士服务，到第一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演出。我们一年至少有几个月时间待在基层部队。在为部队巡演的过程中，我们在哪个连队写出了作品，就要马上编出配乐来，马上为战士们演出。

记得有一次，去海南五指山的鹦哥岭，我们用了四个小时爬到山顶。山顶上就一个班，几名战士组成的一个雷达观通站。山顶条件很差，常年不见太阳，都是云，战士们的被子永远都是湿漉漉的。见到这样的境况，我紧紧地拉着战士们的手不肯放开，才感觉到什么叫“和战士们在一起”。你隔岸喊话，说怎样深入基层、怎么亲近人民都没啥用，你得真正到最基层去，和战士们在一起……

类似这些经历，对我的创作来说无比重要，这是一种阅历的丰富，是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积累。部队生活让我有了更深刻更自觉的意识和态度——战士们需要什么，我就创作什么。

音乐要传递真情和力量

我们当年创作歌曲怕用真名，不主张个人出名，因为个人的作品多了就是不照顾集体，因此大家都是互相谦让的。大家

觉得与戍边守国的战士们相比，这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不能太看重名利。这在当时很正常。当年与我合作的歌唱家卞小贞，我们是同学，我经常叮嘱她，如果别人问是谁写的歌，不要说我的名字，就说是“战士”写的。后来我再写歌，就署名为“战士”。直到1983年，我出第一盘磁带，上面才署名“付林”“俏师”等。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朱德委员长去世，后来毛泽东主席又去世，极度悲痛之余，我爆发出强烈的创作冲动，挥泪作词。我与作曲家王锡仁合作，在防震棚里创作出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由卞小贞演唱，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传遍了祖国大地。

这首歌的走红让我对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做音乐一定要用心用情，要有力量感。从此，我在家一门心思、潜心创作，陆续发表了很多作品。随着名气的提升，请我写歌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对我而言，生活和创作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音乐人，从来没想过要把创作当成商业行为，也绝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当成商品去买卖。我始终觉得，我们有责任通过歌声传递文化的力量，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不能为了利益而吹捧那些不知所以然的歌曲。说到底，好音乐要经得住时间的淘洗。

欠妈妈一个吻太久太久

1980年，我受当时港台流行歌曲的启发，为年仅13岁的歌



付林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手程琳一连写了14首歌曲，这些歌曲中，就数《小螺号》的名声最响亮。这首歌的词曲和编配都由我一人承担。那时，我天天骑着自行车驮着程琳往录音棚赶，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后，程琳在首都钢铁公司礼堂唱响了《小螺号》，“小螺号嘀嘀嘀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嘀嘀嘀吹，浪花听了笑微微。”当时全场掌声雷动，我数了一下，有20多次掌声。

后来，我又创作了《妈妈的吻》，“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质朴亲切的歌词表达了乡村母子间的真挚情感。这首歌后来经过谷建芬老师谱曲，成为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传唱至今。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红得发黑的摇车，母亲成天干活照顾不上孩子，都是大一些的孩子来摇摇车。我印象最深的是，摇车不摇的时候苍蝇会飞过来，摇车里的我会很难受，母亲过来一摇，就把苍蝇赶走了。小时候记不住什么，但那个场景我永远记得。我们家兄弟姊妹很多，可每当腊月十五，母亲都记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她会把5分钱塞进我的掌心，让我出去买个白面馍——那可是当时的“蛋糕”啊！直到2013年母亲去世时，我才发现，其实我欠妈妈一个吻，而且欠得太久太久！

愿“互联网+”让音乐教育阳光普照

除了音乐创作，我还把很多的精力放到了音乐教育上。我的音乐教育可以追溯到1980年，开始我只是带学生，到1988年我办了一个明星班，成立了海政文工团电声乐团、海政文工团青年歌手培训中心。那时候，我们的学生交50块钱学费，有的学生家里困难不交钱也可以来学习。就这样，我们一共办了七期培训班，陈羽凡、满江等都参加过这个培训班。我不是唱歌的，不能具体帮学生练声，但我搞了一套说话式流行唱法，有了这套唱法体系以后，这七期培训班逐渐培养出了不少歌手，包括后来演唱《小苹果》的“筷子兄弟”王太利等。

坦率地说，现在的音乐培训机构鱼龙混杂，一堂音乐课动辄就要一两千块钱。如今，撞上了“互联网+”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希望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借助歌声的翅膀

膀，让自己在古稀之年华丽转身，做好音乐教育的事业。于是，2014年我开办了一个网络音乐学院，设计了一个“慕课”，我就是要让更多的人通过网上视频获得最好、最便捷的音乐辅导，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翟俊杰

1941年10月生，河南开封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主要作品有《血战台儿庄》《共和国不会忘记》《我的法兰西岁月》《长征》《我的长征》《惊涛骇浪》《西藏风云》等，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等，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用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他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对电影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是中国红色军旅电影的探索者，从《血战台儿庄》到三拍长征故事，不断创新、突破、超越；他是演艺界的孝子，多次“带着”母亲拍电影……

古典诗词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电影

1941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书香人家。我的祖母是中国传统的劳动妇女，在夏天乘凉的晚上，她经常给我讲《杨家将》《包青天》《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杨志卖刀》等中国传统故事。我的祖父是女子师范的国文教师，我4岁就开始跟着祖父学习背诵古文，《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岳阳楼记》等大量古代文学经典都是那个时候记下来的。70年过去了，这些古代经典我现在几乎还能倒背如流。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我一生都对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着迷。

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后，我发现，中国古典诗词里就包含了很多电影的元素。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宛如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效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恰似电影中“升”的镜头运用；几乎人人能口

诵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短短四句诗，把构图影像、光调色调、情境气氛、人物感情乃至一种淡淡的画外之音都勾画出来了，极其形象、准确、传神。电影是个舶来品，来到中国才100多年，而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这些电影表现手法，我认为是一种“艺理相通”，这种“艺理相通”是联系文艺领域各个门类的共同纽带，值得好好学习借鉴。

战火洗礼让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责任

1958年，我揣着一厚本祖父抄写装订的文摘，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专业。1959年，我参军当上文艺兵，挎包里装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奔赴遥远的喜马拉雅风雪高原。我经历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文艺兵也要参与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需要演出时，我们就在雪地、草原、哨所、阵地为藏族同胞和战士们表演节目。晚上，我们就在羊圈、牛圈、马厩、汽车轱辘底下，裹着军大衣，把帽耳朵放下来，躺在地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眉毛和帽檐上都覆盖着一层白霜。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远远看到一股浓烟飘上天空。大家摸索着前进，走近了才发现，浓烟是边防五团副团长乘坐的小吉普车燃烧产生的，车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不远处的土丘上有很多弹壳，副团长他们被敌人伏击牺牲了。敌人把油箱

中的油泼到车上，点燃了汽车。当时我们没有像现在影视剧里表现的那般嘶吼、号啕，但每个人都对敌人充满了仇恨，保卫祖国边疆、为战友报仇的决心在每个人心里涌动、激荡。

再后来，我考取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编辑，我常深入到部队的最基层，和战士们一起坐潜艇入深海，乘飞机上蓝天，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军队、对国防的理解。1976年，我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员。当时八一厂有很多名家名将，比如著名编剧徐怀中、史超、黄宗江、陆柱国等，和他们接触，哪怕只是平常聊天，我都感到大有收获。

这些经历都是生活赋予我的积累，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更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三拍长征是我最大的骄傲

战争题材电影是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我一直钟爱于这个题材，先后拍摄了《血战台儿庄》《七战七捷》《大决战》等。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三次拍摄关于长征的电影，每一次拍摄我都力求做到：创新、突破、超越。

第一次拍长征，是30年前的电影《金沙水拍》。我试图通过讲述长征途中毛泽东以及他身边人的故事，营造一种悲壮色彩。影片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长征路上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忍痛将孩子寄托在老乡家。同时，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也参加了长征。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身负重伤。贺敏仁心疼

姐姐，跑到寺庙里拿了几块铜板买酥油，想给姐姐补充一下营养。但是铁的纪律不允许这样的行为，最后贺敏仁被执行了枪决……我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绝不是战史的简单描述，而是在历史资料基础上的艺术加工。

第二次拍长征，是20年前的电影《长征》。我选择诗意化的表现风格，全景式地展现波澜壮阔、悲壮感人的岁月。在音乐上，我采用“声画对立”的手法，惨烈的场面出现的是凄美的《十送红军》歌曲，我还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绝大多数战士在长征途中倒下，永远回不来了。这种“声画对立”引起人们丰富的艺术联想，更加感人。战争年代，红军的服装都是磨破肩头、肘、领子。拍摄时，我们对服装补丁、颜色及汗渍、污渍也都反复推敲、精心处理。我还要求全体演员都要减肥，要研读长征历史资料，这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当时，在演员选择上，我希望塑造一个新的毛泽东的艺术形象，经过反复思考，我请唐国强第一次饰演毛泽东。为演好这部戏，演员们都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

第三次拍长征是前些年的电影《我的长征》。这一次，电影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他的父亲、姐姐、姐夫、战友、连长都在长征的不同阶段倒下了，他历经艰难困苦的磨炼，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影片就是通过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视角，反映长征路上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部红军战士的成长史，更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



翟俊杰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这三部长征作品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我自己理解和发扬长征精神的过程。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是我的职责。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还有意四拍长征故事。我曾多次到井冈山、瑞金、兴国、于都等革命根据地采风，我希望多深入实地，能够获得更多的灵感、更多的故事，实现创新突破、超越前作。

“带着”母亲去拍电影

在拍电影《大决战》前，我的父亲已经病重。我在临出发前给他磕了个头。父亲说，忠孝不能两全。母亲说，公家的事

儿多小也是大事儿，家里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我听了父母的话很感动，洒泪出发了。到达拍摄地后，我就连续收到家里发来的三封电报：“父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归”“父病故速归”。组织上批给我三天假，让我回去送送父亲。父亲遗体火化后，我把一点骨灰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随身携带，晚上就放在枕边。我一直珍藏着父亲生前给我写过的几幅字：“待人以诚，于己坦荡”“艺海奋游，事业成功”“百善孝为先”。

父亲去世后，我更加珍惜母亲健在的日子。早年母亲行动还方便的时候，我为了多陪伴母亲，每次拍戏都会自掏腰包“带着”母亲。老母亲来到拍摄的地方，就跟我睡一个屋子。母亲睡大床，我在房间里支一张小床睡。我在拍摄现场指挥，母亲就坐在我旁边观看。我的分镜头剧本，母亲是第一读者，有时她还会跟我说：“这个镜头，好像不应该用特写，用近景比较好吧？”每当看到母亲健康地陪在自己身边，就是什么话都不说，我也是心安的。

因为对父母的孝行，我被评为第一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我经常告诫儿女：孝道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不孝之人不可交，对于孝道的推崇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们一家人的血液里。我的儿子翟小兴也当选了第四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

拥抱生活才能拥有好故事

文艺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才

能获得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我曾经到赣南红色苏区采风，听说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这位老奶奶和丈夫结婚后第二天，丈夫就随着红军大部队长征了。后来，她的丈夫牺牲在长征路上，但老奶奶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一直在等待丈夫回来，直到去世。我亲自参与了这部专题片的编写录制，并给这部片子起名为《红土地上的望夫石》。老奶奶盼夫归的形象、凝固的眼神，就像是红土地上伫立的石刻雕像。这个故事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如果不是深入基层，可能连片名都想不出来。

我拍军事题材电影的时候，经常告诉演员，把时髦的名牌服装都脱掉，换上戏服，不管是扮演八路军还是红军，都要实地去体验艰苦的生活。真正接触那里的环境后，强烈的反差本身可以让演员更加理解、更加靠近所扮演的人物。

很多人问我，对年轻导演、编剧、演员有怎样的期望？现在国家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期望年轻一代的影视工作者，能真正坚守中华文化，热烈拥抱现实生活，同时汲取先进的电影艺术理念，把国产电影、电视剧拍得更加精彩，不但服务于祖国和人民，而且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向世界艺术化地讲述我们中国的精彩故事。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陈涌泉

1967年10月生，河南唐河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主要作品有《程婴救孤》《风雨故园》《阿Q与孔乙己》《都市阳光》《两狼山上》等，曾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国家文华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

观众之恩当“涌泉相报”

他，是活跃在当今戏曲界的实力派作家；他，多年来致力于传统戏曲的创新与普及；他的作品《阿Q与孔乙己》《程婴救孤》《风雨故园》多次登上世界舞台……

因为热爱让我走近民族戏曲

大学毕业，我进入河南省曲剧团工作，之所以选择到剧团当编剧，归根结底是出于对民族戏曲的热爱。我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河南被人们称为“戏曲之乡”，因为这里有光辉灿烂的戏剧文化。明清以来，在河南有据可查、曾经流行的剧种有45种之多。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专业或业余剧团演出的戏曲剧种仍有豫剧、曲剧、越调、二夹弦、大平调、宛梆、怀梆、太康道情等30余种，受此影响，我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进入剧团前，我就知道戏曲行业不是很景气，但是进剧团后，发现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行业还相当繁荣，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就很少有大学生选择进剧团工作了。很多原本的剧团创作人员都转行另谋高就，演出市场严重萎缩，加上经费投入不够，剧团几年都排不出一台新戏，常常是老戏老演、老演老戏。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河南省曲剧团大院的情景，那里杂草丛生、无处下脚，我背着行李，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住处——一间由杂物间改造而成的宿舍，房间里用“景片”（戏曲演出的背景画）做隔挡，六七个人“群居”在一起。看到这个环境，我心里凉了一大截。扪心自问我也动摇过，而促使自己坚定信心度过那段困难岁月的动力，依然是内心深处对戏曲的热爱，以及后来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后观众给予的热烈掌声。我觉得虽然自己在物质上窘迫一些，但精神上依然富足。我一直发自内心地认为，观众就是戏曲的上帝。作为编剧，我始终记住一个原则：作品是写给千千万万观众看的，只有心里有观众，剧场才可能有观众。

依靠创新开辟传统艺术新境界

艺术创作要以创新为生命。传统戏曲只有与现代艺术元素有机结合，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作为一名编剧，唯有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才能超越传统观念的束缚，将戏剧艺术带向新的境界。

在创作《阿Q与孔乙己》之前，市场上已经有话剧版、电影版、地方戏版的《阿Q正传》，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说，重新改编《阿Q正传》必须对观众有新的吸引力，于是我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有所创新。突然有一天，我想到能否将“阿Q”和“孔乙己”这两个同为鲁迅先生笔下的经典人物进行有机结合。这两个人物，一个代表农民形象，一个代表旧知识分子形



陈涌泉在访谈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象，把这两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结合到一起，应该会产生新的冲突和矛盾。思路打开后，下笔如有神助，很快这部戏就完工并排演了，观众非常认可，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常怀对艺术经典的敬畏之心

虽然艺术创作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对经典的解读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在我看来，改编经典的前提首先是要对经典有敬畏之心，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盲目标新立异。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前提是继承传统，传艺、传神、传德、传真、传善、传美。只有坚持不忘本根、辩证取舍，才能使经

典艺术血脉延续、发扬光大。

我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应属《程婴救孤》了。这部剧在多个国家演出过，累计演了九百多场，今年将第三次赴美国演出。这部改编于《赵氏孤儿》的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是整部戏弘扬了中华民族舍生取义、敢于牺牲、不畏强暴的传统美德和伟大精神。这种美德和精神，也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追求。

创作《程婴救孤》时，我想到了我父亲。解放战争时期，我的大伯是地方游击队小组长，消息走漏后，国民党保安团到家里抓人，父亲被误当成大伯抓到乡公所，吊在梁上拷打半天，但他始终没吭一声。后来大伯、大娘相继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在那个贫困年代，父亲又毅然担起了抚养两个侄子的重任。父亲的精神，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华传统美德就活生生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我要做的，就是用当代观众的审美，挖掘和阐释“程婴们”身上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展现他们的仁爱正义、诚信担当。万丈高楼平地起，文艺经典是艺术创作改变的基础和源泉。戏说、扭曲甚至颠覆经典，作品必定缺血缺钙、干瘪无物，必然会被观众无情抛弃。

赢得青年才能拥有戏曲的美好明天

现在，戏剧观众存在严重老龄化倾向，如何培养青年观众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只有青年观众源源不断地培养起来，观众队伍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戏剧才能有生存的土壤。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致力于这项工作，联合相关部门举办

了《阿 Q 与孔乙己》进校园演出活动，在郑州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师生中产生了良好反响。我创作的剧本《风雨故园》《程婴救孤》先后入选大学语文相关教材。在创作之余，我还经常应邀到高校做戏剧讲座。

过去，很多人认为，青年人不喜欢传统戏曲，但就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认真看过一场演出的学生，都会和戏曲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青年学子们对戏曲之热情、剧场效果之强烈，甚至远远超过了老戏迷。记得《阿 Q 与孔乙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演出时，两场演出不约而同出现了相同的场景：楼上楼下两千观众和剧中人齐声朗诵台词，绿色海洋里掀起滚滚声浪，场面十分震撼。其实，戏曲与青年的心灵距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与其花精力讨论青年喜不喜欢戏曲，不如赶快拿出实际行动来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赢得了青年观众，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才会真正拥有灿烂的明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015年，我获得了“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这是党和人民授予我的崇高荣誉，我更愿把它看作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一种期望。艺无止境，德需长修，德艺双馨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会一直铭记在心，孜孜以求。

河南卫视《梨园春》栏目曾经给我做一台晚会，将我的主要作品汇聚在一起，给戏迷朋友一个集中展示。大家讨论这台

晚会要叫什么名字时，我毫不犹豫地说叫“涌泉相报”，因为这个名字能反映我的创作观念和心路历程。踏入戏剧界以来，我在创作中得到了很多领导、专家、老师的帮助，特别是当自己的作品登上了舞台之后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所有作品来源于人民，是人民赋予了我创作题材和灵感，我的作品理应回报给人民。

人民不仅给我们提供鲜活生动的素材，还赐予我高超的创作“技巧”。我在剧团工作这么多年，每次随团演出时，往往是观众看戏、我看观众——我会坐在舞台一侧，透过幕条观察观众，哪一点他们笑了，哪一点他们哭了，哪个情节他们无动于衷，哪个情节他们反响强烈。我把观众的一颦一笑记在心上，认真揣摩，仔细领悟，日积月累，逐渐锻炼出一种能力。写剧本时，仿佛就面对着观众，每写一段，我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反应，这样就可以有效管控自己，掌握无法之法，写出观众爱看的戏。

作为戏剧人，我一定会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用最美的乡音和老腔，唱响时代的乐章，让戏剧艺术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更加出彩！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

后记

2015年9月，由中央文明办、光明日报社指导，中国文明网联合中宣部文艺局、光明网共同主办的“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邀请文艺界艺术造诣高、社会影响大、群众口碑好的文艺名家，结合个人工作生活经历，结合文艺界开展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与广大网友分享他们的艺术创作道路，大力弘扬真善美、大力弘扬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从而展现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牢记责任使命，自觉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中国文明网和光明网首发，联合全国380多家地方文明网及“两微一端”矩阵共同推送，光明日报及全国10余家地方都市报同步转载。截至2016年底，共播发18期节目，引起文艺工作者和网民、读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积极的引导效果和热烈的社会反响。

现将第一批推出的18期“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的图文内容精心汇编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感谢参与活动宣传推送的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以及信息时报、三晋都市报、新晚报、新民晚报、金陵晚报、合肥日报、合肥晚报、江淮都市报、海峡都市报、青岛晚报、楚天都市报、重庆晚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等地方都市报。

编者

2017年10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 文艺名家讲故事 / 中央文明

办中国文明网编.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94-2986-7

I . ①深… II . ①中… III .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7932号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 文艺名家讲故事

SHENRU SHENGHUO ZHAGEN RENMIN: WENYI MINGJIA JIANG GUSHI

编 者: 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

责任编辑: 谢 香 李 倩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谭 锵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号, 100050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010-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renqing339@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2986-7

定 价: 42.00元